

# 才女史評越扶桑——和刻本李晚芳 《讀史管見》的出版與流傳

衣 若 蘭\*

## 提 要

《讀史管見》為清代廣東女史李晚芳（1692-1767）所著，是一部議論司馬遷《史記》的史評著作。目前各大圖書館所藏之版本，多為日人池內陶所（1814-1863）於江戶末期校訂之和刻本。一位生活在 18 世紀廣東順德的女子，其著作為何會流傳至日本？在日本如何被翻刻？本文嘗試辨析和刻本《讀史管見》的出版與流傳，盼以此為例，一窺 19 世紀中日書籍與出版文化交流史，並省思書籍交流史研究之整合，以及專屬於「東亞」書籍史的可能性。

關鍵詞：《讀史管見》 李晚芳 池內陶所 和刻漢籍 中日書籍交流史

\*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10617 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 4 段 1 號；E-mail: yilan@ntu.edu.tw.



臺灣大學學術  
期刊資料庫

## 前 言

一、《讀史管見》版本與內容大要

二、《讀史管見》在日本的翻刻

三、《讀史管見》之流傳

餘論：文化交流與書籍史研究

## 前 言

江戶時代（1603-1867）是中日書籍交流最頻繁的時期之一，據保守估計，1714 至 1855 年間，共約有 6,163 種，57,204 冊漢籍由長崎輸入日本。<sup>1</sup>除了大量輸入漢籍（唐本）以外，此時期翻刻漢籍亦十分盛行，一般稱日人翻刻之漢籍為「和刻本漢籍」。根據大庭脩（1927-2002）的研究，江戶時代之和刻漢籍約有四千餘件，<sup>2</sup>其中多為清人著作，可見當時日人對於清代學術、文史的興趣。<sup>3</sup>且以書籍的流通來說，在日本，和刻漢籍因為相對於唐本價格便宜，容易取得，對日本知識界的影響不容小覷。部分和刻漢籍經由各種管道回傳中國，有的補充中國失傳或罕見的古籍，有的附有註解、校刊、序跋，提供我們瞭解日本漢學發展的可貴訊息。<sup>4</sup>

1 [日]大庭脩，《江戶時代における中国文化受容の研究》（京都：同朋舎，1984），頁 52-53，「書籍持渡量船表」。

2 大庭脩從《商舶載來書目》中估計江戶時代元祿六年（1693）到享和三年（1803）間（非整個江戶時代）的漢籍有 4,982 件（包含部分重複），見 [日]大庭脩，《漢籍輸入の文化史：聖德太子から吉宗へ》（東京：研文出版，1997），頁 173。

3 中山步根據長澤規矩也的目錄理出清人著作 578 種，如毛奇齡《西河合集》、《四書臆言》與顧炎武《左傳杜解補正》等，刊刻時間集中在天保至明治初期。見 [日]中山步，〈和刻本清人著述研究〉（上海：復旦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心博士論文，2008）。

4 可參張惠寶、李國慶，〈中國圖書館所藏和刻本漢籍及其文獻價值〉，《圖書館工作與研究》1999 年第 2 期（天津），頁 45-47。陳捷，《明治前期日中學術交流の研究——

江戶時期漢籍多經由商船從長崎輸入，因此關於此時期的中日文化交流史相關研究往往涉及貿易史，大庭脩的研究即是絕佳範例，若干學者在其基礎之上，承續此研究方向。<sup>5</sup>然這些研究較少涉及與本文相關的幕末（約 1853-1868）至明治時期（1868-1912），19 世紀中末葉，漢籍東傳日本的歷史，仍存有不少疑點，尚待釐清。

《讀史管見》為清代廣東才女李晚芳（1692-1767）所著，內容針對《史記》（109-91 BC）的部分篇章，進行摘抄與評點。本書在中國出版於 18 世紀末，至 19 世紀中葉日人池內陶所（1814-1863）加以校訂，於大阪翻刻出版。一位罕為人知的 18 世紀才女，她的史評如何被出版與流傳？池內陶所的背景為何？他於何種機緣校訂、出版本書？本書共有哪些版本？翻刻的情形如何？它在怎樣的出版文化背景之下產生？由本書

---

清国駐日公使館の文化活動》（東京：汲古書院，2003），頁 261-264。另，〔日〕高津孝，〈和刻本漢籍多樣性〉，收入〔日〕大澤顯浩編，《東アジア書誌学への招待》（東京：東方書店，2011），卷 1，頁 111-128。朱珊，〈船載書目所載明人別集考述〉，收入王勇主編，《東亞座標中的書籍之路研究》（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2012），頁 302-339。關於和刻本的發展，可參金程宇，〈《和刻本中國古逸書叢刊》前言〉，《東華漢學》第 16 期（2012，花蓮），頁 254-285。

- 5 大庭脩的研究成果有：大庭脩，《江戶時代における唐船持渡書の研究》（吹田：關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1967）；大庭脩，《江戶時代における中国文化受容の研究》，中譯本見戚印平、王勇、王寶平譯，《江戶時代中國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8）；大庭脩，《漢籍輸入の文化史：聖德太子から吉宗へ》。王勇之編著，亦有助於我們瞭解中日的「書籍之路」，參陸堅、王勇主編，《中國典籍在日本的流傳與影響》（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0）；王勇、大庭修主編，《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 9 典籍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王勇等，《中日「書籍之路」研究》（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王勇，《書物の中日交流史》（東京：國際文化工房，2005）；王勇主編，《書籍之路與文化交流》（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9）；王勇主編，《東亞座標中的書籍之路研究》（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2012）。近來范金民根據永積洋子與大庭脩提供的日本史料，研究 17-18 世紀中日書籍銷售，見范金民，〈縹囊緗帙——清代前期江南書籍的日本銷場〉，《史林》2010 年第 1 期（上海），頁 75-88、188-189。可惜永積洋子所編的資料沒有羅列書目，見〔日〕永積洋子編，《唐船輸出品數量一覽 1637~1833 年——復元唐船貨物改帳・帰帆荷物買渡帳——》（東京：創文社，1987）。

的刊刻，可以窺見中日書籍文化交流史的哪些面向？以上均為本文試圖探究的課題。

日本刊刻漢籍始於 8 世紀，然其刻版事業到 16 世紀以前，都是以宗教內容為重心。中古時代日本私家刊刻漢籍以傳播漢文化為宗旨，至江戶時代刊刻漢籍則具有商業性質，值得注意。<sup>6</sup>和刻本漢籍是中日相互瞭解的一個重要媒介，也是觀察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徑之一。長澤規矩也(1902-1980)投入畢生的精力於其研究，從版本調查到書目整理等等，但遺憾的是，其調查結果關於本文所要討論的《讀史管見》一書，訊息不多。近年學者針對和刻本清人著述，論其特點及接受史，讓我們瞭解清代著作被翻印為和刻本之梗概，然對於《讀史管見》一書因版本調查不全，加以中文解讀有誤，以致錯誤不少。<sup>7</sup>其他涉及李晚芳的研究，則多未注意到該書和刻本的相關議題。<sup>8</sup>

目前在中國大陸各大圖書館收藏之《讀史管見》以和刻本為多，<sup>9</sup>可

6 嚴紹璁，《漢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頁 121、153、160。

7 中山步，〈和刻本清人著述研究〉。《讀史管見》在中國大陸許多圖書館均有收藏，然作者僅以復旦大學藏之殘缺本論之。

8 僅劉詠聰注意到本書多種版本，提及和刻本，劉詠聰，〈「婦德莫病於私」——論李晚芳《女學言行纂》的「去私」思想〉，收入熊秉真主編，《欲掩彌彰：中國歷史文化中的「私」與「情」——私情篇》（臺北：漢學研究中心，2003），頁 468。其他多未論及，如宋清秀，〈清代才女文化的地域性特點——以王照圓、李晚芳為例〉，《浙江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 年第 4 期（金華），頁 35-39；劉正剛、喬玉紅，〈清前期廣東才女李晚芳探析〉，《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 年第 2 期（廣州），頁 153-160；Ellen Widmer, "Guangdong's Talented Women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in *Text, Performance, and Gender i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Music: Essays in Honor of Wilt Idema*, ed. Maghiel Van Crevel et al.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09), pp. 293-309。劉正剛點校《李萊猗女史全書》，收錄其相關李晚芳之研究，然未深究版本問題，讀者無以知悉其對照之和刻《讀史管見》版本為何。〔清〕李晚芳著，劉正剛整理，《李萊猗女史全書》（濟南：齊魯書社，2014）。

9 有關中國大陸《讀史管見》和刻本的收藏情形，可參王寶平主編，《中國館藏和刻本漢籍書目》（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5），頁 180。

見此版本又西傳中國。今日我們欲閱覽本書，頗需倚賴存留的和刻版本，從《讀史管見》的流傳（傳出與回流），既可追溯漢籍在日本刊刻的歷史，亦可考察本書流布中國的情形，為觀察 19 世紀中日書籍出版文化的互動、融合與轉化的一個例證。<sup>10</sup>

追溯一部不著名的書籍在 18 至 19 世紀中日之間的出版流傳，有相當的困難度。即使長年耕耘中日書籍交流史的大庭脩亦認為，江戶時期輸入日本的漢籍，除了最後被收入內閣文庫與宮內廳書陵部的書籍，其他書籍傳布的情形不易得知，也難以估計其對日本知識界的影響。<sup>11</sup>本文不揣淺陋，考察清代女史李晚芳《讀史管見》中日版本之差異，追尋其流傳中日之間的過程，期望能稍補江戶末至明治時期之中日書籍交流史。

## 一、《讀史管見》版本與內容大要

李晚芳（康熙三十年生，乾隆三十二年卒，1692-1767），廣東順德龍津堡人，父親李心月（字興松），母親姓名不詳，家中有五兄一姊，<sup>12</sup>年二十歸碧江梁永登（字遠略），婚後育有二女一子（女名不詳，長女

---

10 本研究著重在中日文化交流之「過程」，而不僅僅是交流之「結果」，誠如學者所言，這樣的研究取徑更有助於瞭解區域之間的互動、衝突、重塑、轉化或融合。參黃俊傑，《東亞文化交流中的儒家經典與理念：互動、轉化與融合》（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0），頁 12-16。關於東亞文化交流之研究方法，參此書第一章與近年作者提到的「去脈絡化」與「再脈絡化」概念，見黃俊傑，〈東亞文化交流史中的「去脈絡化」與「再脈絡化」現象及其研究方法論問題〉，《東亞觀念史集刊》第 2 期（2012，臺北），頁 55-77。

11 大庭脩，《江戶時代における中国文化受容の研究》，頁 227-314。

12 〔清〕李晚芳，《讀史管見》（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日本安政三年〔1856〕浪華書林羣玉堂刻本），〈序〉，頁 9b。見加拿大麥基爾（McGill）大學、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明清婦女著作數字計劃」（<http://digital.library.mcgill.ca/mingqing/chinese/>）。本文主要使用此刻本，除非特別註明。

適王洪進、次女適李福，子梁煒）。晚芳姊李碧芳為碧江蘇門貞婦，未婚守貞，晚芳少曾從其習經史，<sup>13</sup>「自《左》、《國》、秦漢及唐宋大家之文，無不遍覽。自龍門扶風以下諸史，無不淹貫」。<sup>14</sup>晚芳恆以聖賢自期，人稱女宗，廣東士人蘇珥（1699-1767）與何夢瑤（1693-1764）重之。<sup>15</sup>其所居曰「菴猗園」，晚號「菴猗老人」。著有《女學言行纂》、《讀史管見》、《鄉俗居喪闢謬》、《釋古周禮》、《續女誠》等書，<sup>16</sup>人稱其「七十年來著書滿屋，……高樓讀史，眼光達幽，道氣內腴，述作具識」，<sup>17</sup>「研究經史，兼擅制義，著論多前人所未發」。<sup>18</sup>

《讀史管見》一書原名《讀史孩見》，<sup>19</sup>作者李晚芳原不願將之付梓，然晚芳身後，乾隆四十一年（1776）夫家梁氏因遭祝融，不少書籍歸於灰燼，晚芳著作唯存有《釋古周禮》與《讀史管見》，晚芳之姪梁

13 參〔清〕梁景璋，〈叔母李孺人墓誌銘〉，《女學言行纂》，收入李晚芳，《李菴猗女史全書》（安徽建德：周氏師古堂，1937；廈門大學與北京國家圖書館藏）。又《讀史管見》中，晚芳即提到曾與姊論《史記》〈蔡澤范雎傳〉，見該書卷2，頁68a。

14 〔清〕梁煒，〈先慈行跡錄〉，《菴堂分田錄》，收入李晚芳，《李菴猗女史全書》，頁1a。

15 〔清〕黃芝，《粵小記》，收入吳綺，《清代廣東筆記五種》（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6），頁408。

16 關於李晚芳生平，詳參劉詠聰，〈「婦德莫病於私」〉，頁464-467。胡文楷編著，張宏生等增訂，《歷代婦女著作考（增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頁261；Clara Wing-chung Ho, "Li Wangfang," in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Women: The Qing Period, 1664-1911*, ed. Clara Wing-chung Ho (New York and London: M. E. Sharpe, 1998), pp. 120-124. 另見本書中譯本：劉詠聰主編，《中國婦女傳記辭典：清代卷》（悉尼〔Sydney〕：悉尼大學出版社，2010），頁87-90。洗玉清，《廣東女子藝文考》（長沙：商務印書館，1941），頁1-8。劉正剛，〈康熙朝廣東村姑評《史記》〉，收入李晚芳著，劉正剛整理，《李菴猗女史全書》，頁359-376。

17 〔清〕宗聖垣，〈菴猗女史像讚〉，收入李晚芳，《讀史管見》。

18 洗玉清，《廣東女子藝文考》，頁1。

19 〔清〕李履中，〈讀史孩見跋〉，收入李晚芳，《讀史管見》，頁1a。論者推測之所以稱為《讀史孩見》，與此書為作者婚前所作有關，見劉詠聰，〈「婦德莫病於私」〉，頁468。



景璋（莪軒）催促晚芳子梁煒（震科）將之刊刻出版。<sup>20</sup>本書自序原著於康熙丁亥（康熙四十六年，1707），當時她年方15歲，而庚寅年（康熙四十九年，1710）她18歲時，又寫了〈讀史摘微〉一文，因此推測《讀史管見》約作於康熙四十六至四十九年左右，也就是18世紀初期。該書最終由晚芳之叔李履中（介堂）與梁景璋共同校訂，梁煒付刻，於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日本天明七年）刊刻，此時已是晚芳逝世20年之後。

關於《讀史管見》的版本，目前所見主要有四：

（一）清嘉慶二十二年（1817）印本：據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謄園藏版刻印，三冊，有圖像一幅，版式半頁十行，一行二十四字，無行格。有夾註圈點、眉批小字，每行六至八字，版心白口（未印黑線），四周雙邊，<sup>21</sup>另有旁批，以及乾隆己酉五十四年（1789）宗聖垣（1735-1815）<sup>22</sup>所撰像贊，伍鼎臣嘉慶丁丑二十二年序。<sup>23</sup>封面鐫「乾隆五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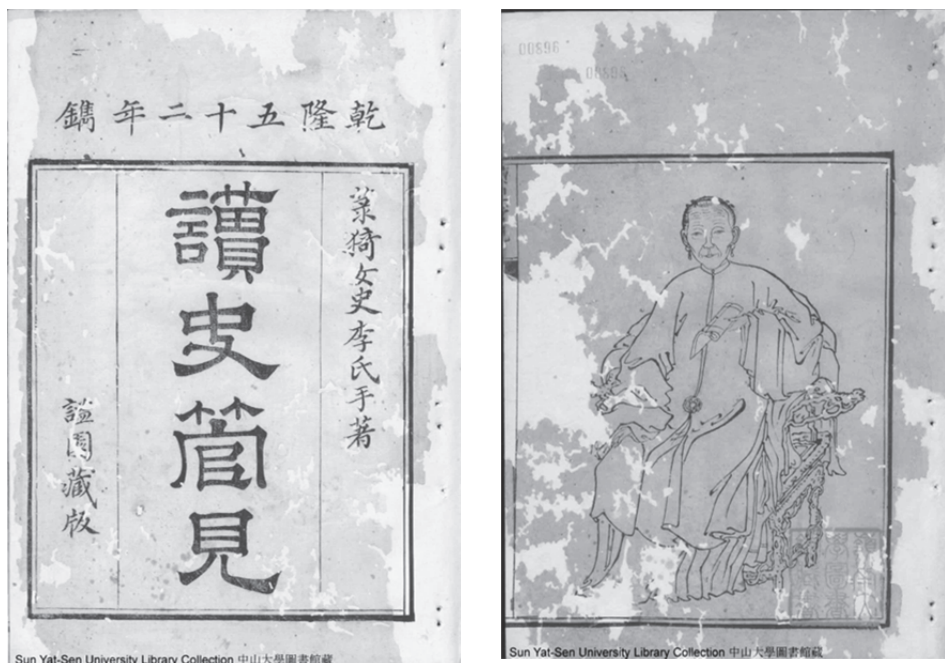
20 見梁景璋，〈序〉（乾隆乙巳〔1785〕），收入李晚芳，《讀史管見》，頁7。

21 見中山大學圖書館編，《中山大學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廣州：中山大學圖書館，1982），頁87。然夾註、眉批是否為李晚芳本人或梁景璋、梁煒所註記，尚難論斷，李晚芳著，劉正剛整理，《李萊猗女史全書》，頁199。

22 宗聖垣，字芥驅，浙江會稽人，乾隆三十九年（1774）舉人，乾隆五十七年（1792）任廣東德慶州知州，嘉慶朝曾任廣東雷州府、瓊州府、惠州府同知。著有《九曲山房詩集》十六卷。參〔清〕阮元等修，江藩等纂，《廣東通志》（臺北：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1959），卷49、54、55；〔清〕屠英等修，胡森、江藩等纂，《肇慶府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67 據清道光十三年〔1833〕修、光緒二年〔1876〕重刊本影印），卷13；〔清〕劉錦藻，《清朝續文獻通考》（臺北：新興書局，1959），卷279。

23 伍鼎臣，生卒年不詳，約生活於19世紀上半葉，字和齋，湖南武陵人，舉人。曾任廣東電白（嘉慶十五年，1810）、陽山知縣（嘉慶十七年，1812），嘉慶二十二年（1817）為本書寫序時，任廣州府龍門縣署任代理知縣，嘉慶二十三年（1818）任廣東四會知縣。道光元年（1821）編有《四會縣志》。見〔清〕瑞麟、戴肇辰等修，史澄等纂，《廣州府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66 據光緒五年〔1879〕刊本影印），卷27，頁26a；屠英等修，胡森、江藩等纂，《肇慶府志》，卷6，頁18b；〔清〕楊霽修，陳蘭彬等纂，《高州府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67 據清光緒十五年〔1889〕刊本影印），卷21，頁37a；〔清〕黃瓚修，朱汝珍纂，《陽山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4 據清光緒

年鐫 菴猗女史李氏手著 讀史管見 謚園藏版」、版心下有「菴猗園」字樣。卷端題曰：「順德龍津菴猗女史李晚芳著 叔李履中介堂 姪梁景璋莪軒校訂 男梁煒震科敬梓」（見圖一）。由本書 1817 年序言推測，1787 年謚園刻本至 1817 年後再度刻印。<sup>24</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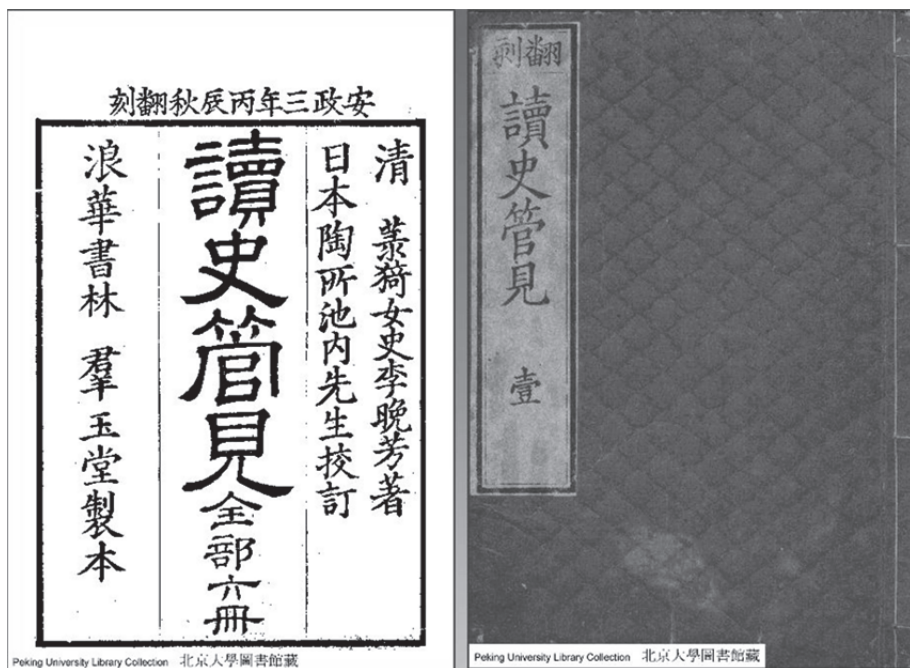
圖一 《讀史管見》（嘉慶二十二年印本）封面與像贊書影，廣州中山大學圖書館藏  
資料來源：「明清婦女著作數字計劃」，<http://digital.library.mcgill.ca/mingqing/chinese/>。

十六年〔1890〕修、民國二十六年〔1937〕重印本影印），卷 4，頁 11b；〔清〕陳志喆等修，吳大猷纂，《四會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67 據民國十五年〔1926〕刊本影印），頁 58-59。

24 〔清〕菴猗女史李氏手著，《讀史管見》（乾隆五十二年刻謚園藏版，清嘉慶年間印本；廣州中山大學圖書館藏）；又嘉慶二十四年（1819）王勳臣曾為《李菴猗女史全書》寫序，可能嘉慶年間才將《女學言行纂》、《讀史管見》與梁煒《菽堂分田錄》合刊。另 Ellen Widmer 宣稱《讀史管見》在 1765 年和 1787 年刊刻了兩次，不知何所據，見 Ellen Widmer, “Guangdong’s Talented Women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p. 2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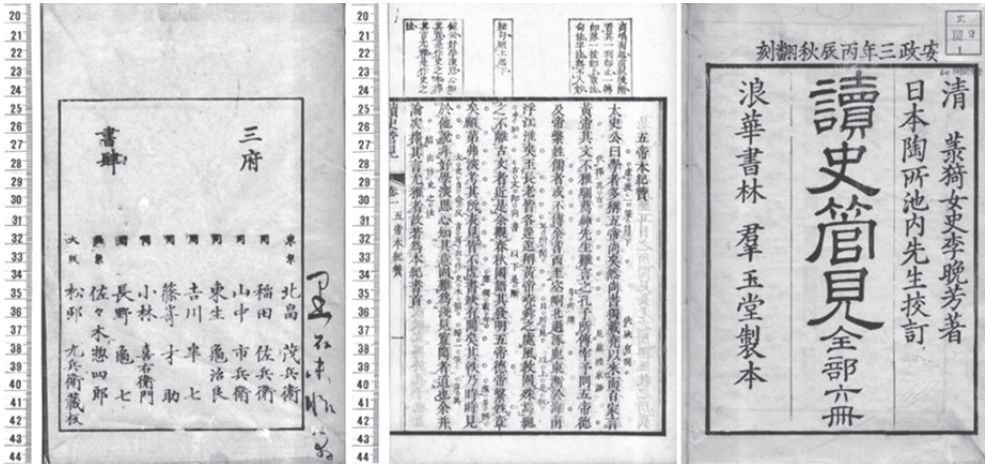
(二) 安政三年(1856)和刻本：三卷六冊，京都如射書院藏版。「見返」(封面後之扉頁，但不單獨成頁，與封面黏在一起)標示：「清菴猗女史李晚芳著 日本陶所池內先生校訂 安政三年丙辰秋翻刻 浪華書林 羣玉堂製本」(圖二)。浪華即大阪；此刻本與嘉慶印本之不同在於無肖像與像贊，版心下亦無「菴猗園」字樣，並加上日本訓點之「返點」(訓讀漢文時，加於漢文左邊之符號，用以標示訓讀之順序)。版式每半頁從原本的十行改為九行，同樣一行二十四字，亦無行格，保留原有之夾註、圈點、眉批與旁批，另在原眉批上加框，版心亦為白口，版心下無「菴猗園」字樣，版框改為上下單邊，左右雙邊。



圖二 《讀史管見》(安政三年本)封面與見返書影，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資料來源：「明清婦女著作數字計劃」，<http://digital.library.mcgill.ca/mingqing/chinese/>

(三) 明治年間和刻印本：據安政三年版印，有多家印本。根據長澤規矩也的調查，《讀史管見》尚有明治年間印本，如京攝五書堂、大

阪河內屋喜兵衛與松邨九兵衛（參圖三）三種印本，<sup>25</sup>筆者另見有河內屋岡田茂兵衛與積玉團柳原喜兵衛印本，有些明治印本將池內陶所的〈刻讀史管見敘〉置於書後，有的則將之刪去。<sup>26</sup>



圖三 《讀史管見》（明治年間本）書影，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藏

資料來源：全國漢籍データベース（日本所藏中文古籍數據庫），  
<http://kanji.zinbun.kyoto-u.ac.jp/kanseki?record=data/FA019705/tagged/0309016.dat&back=1>.

（四）民國周氏師古堂影印本：六冊（二函），民國二十六年（1937）至德周氏師古堂據乾隆刻本影印，<sup>27</sup>版心下鐫有某猗園。本書集晚芳《女

25 [日]長澤規矩也，《和刻本漢籍分類目錄》（東京：汲古書院，1976），頁65。他將該書列為正史類。早稻田大學所藏《讀史管見》見返標示為「京攝五書堂合梓」，而非「羣玉堂製本」，此版權頁亦標示安政三年官許。然這個版本是否同長澤所見，而被鑑定為明治時代，或者在明治年間除了群玉堂，還有別的製本，尚待考證。

26 例如復旦大學所藏之《讀史管見》為積玉團柳原喜兵衛發行。此敘應為後來裝訂時，置於後，與前文不連貫。感謝復旦大學圖書館李春博博士協助，以利筆者對比研究。而長崎大學圖書館所藏《讀史管見》為羣玉堂河內屋岡田茂兵衛刊發行，無池內的序言，但有前述安政三年的見返。

27 胡文楷編著，張宏生等增訂，《歷代婦女著作考（增訂本）》，頁261。此書曾寄售於北京琉璃廠直隸書局。

學言行纂》三卷、《讀史管見》三卷與梁燁《菽堂分田錄》一卷，而為《李菴猗女史全書》。筆者所見廈門大學與北京國家圖書館藏此版《讀史管見》（上、中、下三冊），亦有伍鼎臣嘉慶丁丑（1817）的序言，因此周氏師古堂所據應為嘉慶印本。《販書偶記》作者孫殿起（1894-1958）在 20 世紀所見「《讀史管見》三卷。清順德女史李晚芳撰，乾隆五十二年菴猗園刊，近影印本」，<sup>28</sup>極有可能是這個影印本。2014 年劉正剛點校出版者，即為此版本。

本文討論和刻本《讀史管見》，所徵引的版本為北京大學圖書館藏，京都如射書院藏版，也就是安政三年本。

乾隆丙午（乾隆五十一年，1786），謝方端（1724-1813）<sup>29</sup>女史為之序，提到其因隨長子至廣東龍門縣任官，其學署中多藏史書，得以有機會細讀《史記》，並常與兒子討論，然仍有不清楚之處，如今讀李晚芳一書，「則余之所論及者，與所未議及者，瞭如也」，終得以迎刃而解。且謝方端認為：「自古名媛，多以詩詞顯，而著述則罕聞焉。」她稱讚晚芳異於其他才女以詩詞為名，著書立說，曰其「摘微辨論，實能洞悉深奧」，並稱之：「昔曹大家上繼史遷，今李孺人論註史記，古今輝映。」<sup>30</sup>在此，她將李晚芳與班昭（49-120）的史才相比。

李晚芳曾提及本書寫作的緣由，她自幼與兄姊同隨父親讀書，於織紉之餘讀史，特別傾心於班昭之才德，其曰：

留心稽古，雅慕昭之為人。奇其志，嘉其遇，喜讀其書。因溯源而讀龍門之書。索玩久，若漸知門徑。不揣孩見，隨所得而識之。先

28 孫殿起錄，雷夢水整理，《販書偶記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卷 8，史評類，頁 100。

29 謝方端，廣東陽春人，字小樓，號春洲女史。父為雍正癸卯解元謝仲壘，夫為貢生劉宗衍，子為和平縣訓導劉世馨。幼從父宦遊，通鑑史、工詩詞，時人比之宣文君，著有《小樓吟草》2 卷。參冼玉清，《廣東女子藝文考》，頁 29；胡文楷編著，張宏生等增訂，《歷代婦女著作考（增訂本）》，頁 585。

30 [清]謝方端，〈序〉，收入李晚芳，《讀史管見》，頁 1-2。

哲之評，愜鄙懷者悉登之，仍不敢自信也。<sup>31</sup>

亦即晚芳因讀班昭史著，其後讀司馬遷之大作，頗有心得，於是節錄《史記》之原文，加上前人對《史記》之評論與自己的意見而成書。<sup>32</sup>清人伍鼎臣稱之：

集人之見以為見，而見不妨同。或據己之見以為見，而見不嫌異。或深予馬遷之見，而以己見躋之。或深非馬遷之見，而以己見駁之。<sup>33</sup>

認為李晚芳統合《史記》原書與其他歷朝相關的評論，抒發己見。其史評被視為：「淹貫百家，獨出己見。」<sup>34</sup>

本書共分為三卷，擇錄了《史記》〈項羽本紀〉、〈高祖本紀（節錄）〉兩篇本紀，四篇表序：〈三代世表序〉、〈六國表序〉、〈秦楚之際月表序〉、〈高祖功臣年表序〉；〈封禪書〉、〈平準書〉二書；一篇〈曹相國世家（節錄）〉，以及十六篇列傳（〈伯夷列傳〉、〈管晏列傳〉、〈蘇秦列傳（節錄）〉、〈白起王翦列傳（節錄）〉、〈信陵君列傳〉、〈范雎蔡澤列傳〉、〈魯仲連列傳（節錄）〉、〈屈賈列傳（錄屈）〉、〈李斯列傳（節錄）〉、〈淮陰侯列傳〉、〈酈生陸賈列傳〉、〈魏其武安侯列傳〉、〈汲鄭列傳〉、〈酷吏列傳〉、〈貨殖列傳〉等）；一篇論贊：〈五帝本紀贊〉，以及〈報任少卿書〉。內容所取約為《史記》全書的五分之一。

晚芳十分讚揚司馬遷的文字，例如她認為在〈五帝本紀贊〉中，其「文凡九節，節節聯貫；字僅二百，字字精嚴。」<sup>35</sup>〈封禪書〉中則「處處微詞點諷，以為眼目，全用活筆描寫，虛字翻弄，通篇無一實筆，無一板句。」<sup>36</sup>又稱太史公寫項羽，實「以神勇之筆，寫神勇之人」，乃

31 李晚芳，〈序〉，收入李晚芳，《讀史管見》，頁9b-10a。

32 其所引前人之說有明人王鏊、鍾惺、陳仁錫、唐順之、楊慎等11人。洗玉清，《廣東女子藝文考》，頁5亦提及。

33 〔清〕伍鼎臣，〈讀史管見序〉，收入李晚芳，《讀史管見》，頁4b。

34 李履中，〈讀史孩見跋〉，收入李晚芳，《讀史管見》，頁1b。

35 李晚芳，《讀史管見》，卷1，〈五帝本紀贊〉，頁2b。

36 李晚芳，《讀史管見》，卷1，〈封禪書〉，頁72a。



千古無二。<sup>37</sup>以太史公〈三代世表〉的章法、結構、立論、措辭，不離孔子家法，「宜史記繼麟經，而千古不磨也。」<sup>38</sup>

但她對太史公也非毫無微詞，她以為司馬遷才學淵博，但可惜「其立意措辭，多有憤忿不平之過」，故「平準、封禪，盡屬謗書。諸傳諸贊，半借以抒其憤忿不平之氣。」<sup>39</sup>晚芳還認為〈屈原傳〉實是司馬遷「自抒其一肚皮憤懣牢騷之氣，滿昏俱是怨辭。」<sup>40</sup>而〈報任少卿書〉更是通篇皆「舒憤懣」之詞。<sup>41</sup>她以為孔子作《春秋》，其心「平如止水」，批評司馬遷最大問題在於無「內省」，「靈臺未淨，則繫累偏僻之私，往往吐露於字裏行間，而不自檢」，以為「操是心而修國史，大本已失」，<sup>42</sup>亦即認為司馬遷滿懷憤懣，修史已難持平公允。

晚芳在本書中提到史學書寫的理論，例如其曰：「傳者，詳其平生言行而著之，以傳其人之謂。」<sup>43</sup>而其史評，被視為「即老師宿儒畢生窮經稽古，亦展卷而驚，望為河漢也」。<sup>44</sup>對於她批評太史公救李陵不得法，伍鼎臣稱其「此固非有大才大學大識，不能為斯論者」，<sup>45</sup>李晚芳的史才與史識，可見一斑。

李晚芳為廣東順德人，順德鄰近佛山出版發售市場，順德縣的馬岡

37 李晚芳，《讀史管見》，卷1，〈項羽本紀〉，頁23b。

38 李晚芳，《讀史管見》，卷1，〈三代世表〉，頁37b。

39 李晚芳，〈讀史摘微〉，收入氏著，《讀史管見》，頁11a、13a。

40 李晚芳，《讀史管見》，卷2，〈屈原列傳〉，頁83a。

41 李晚芳，《讀史管見》，卷3，附〈報任少卿書〉，頁88b。

42 李晚芳，〈讀史摘微〉，收入氏著，《讀史管見》，頁11b、13a。然論者將李晚芳的論點，放在《史記》「謗書說」一類，認為其觀點反映清代士大夫失去批判精神，僵化於儒家正統思想的一面，以最高統治者的態度作為批判的尺度。見丁琴海，〈《史記》辨旨——關於《史記》創述宗旨三種觀點的現代解讀〉，《東岳論叢》第22卷第4期（2001，濟南），頁89-90。實則李晚芳本書中的論點，更符合作者所提的另一個類型：「發憤著書說」。

43 李晚芳，《讀史管見》，卷2，〈管晏列傳〉，頁26b。

44 梁景璋，〈序〉，收入李晚芳，《讀史管見》，頁6b-7a。

45 伍鼎臣，〈讀史管見序〉，收入李晚芳，《讀史管見》，頁4b-5a。



刻書業在清代十分蓬勃（有不少女刻工投入生產），<sup>46</sup>她所居住的碧江又產紙，對於本書的出版提供了絕佳的條件。晚芳子即曾回憶道：「幸吾鄉有藝紙之業，婦女可家居力作，所獲可食一二人。先慈督家姊併力從事，時煒年僅十一，亦命出市就販，獲升合以相濟。」<sup>47</sup>足見他們可能經營紙的手工作坊。而本書的序言等相關史料可見本書的讀者，除了家人親戚，例如其叔李履中、姪梁景璋、子梁煒，以及乾隆末至嘉慶年間曾在廣東任官的宗聖垣、伍鼎臣（自稱姻末，應有姻親關係）、王勳臣<sup>48</sup>，梁煒的老師歐功煥，以及曾在廣州粵秀書院教書的許乃濟（1777-1839）<sup>49</sup>，還包括同樣生於廣東、隨子宦遊至龍門縣的謝方端，均有機會一睹本書。其次，阮元（1764-1849）主編的《廣東通志》（嘉慶二十三年至道光二年，1818-1822）「藝文略」，錄有《讀史管見》書名與謝方端之序文，<sup>50</sup>此序未見收入他處，推測本志編者可能亦讀過此書。

在此值得注意的是，明清時代出版印刷與女性之間的連結。清代坊刻盛行，且女性受教育者並不少見，女性的文才被肯定，以及文人社群師長相助編選出版，均可說提供了女性著作刊刻的環境。<sup>51</sup>關於本書藏

46 據咸豐《順德縣志》記載：「今馬岡鏤刻書板，幾遍藝林，婦孺皆能為之。男子但依墨蹟劃畫界線，餘並女工，故值廉而行遠。」見〔清〕郭汝誠修，馮奉初等纂，《順德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4 據清咸豐三年〔1853〕刊本影印），卷3，〈輿地略〉，頁50a。Cynthia J. Brokaw, *Commerce in Culture: The Sibao Book Trade in the Qing and Republican Period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distributed b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545-548.

47 〔清〕梁煒，〈先慈行跡錄〉，《菽堂分田錄》，收入李晚芳，《李萊綺女史全書》，頁3b。

48 嘉慶五年舉人，嘉慶二十四年（1819）順德知縣任上曾為《李萊綺女史全書》作序。

49 〔清〕許乃濟，〈梁震科先生傳〉，李晚芳，《女學言行纂》，收入李晚芳，《李萊綺女史全書》，頁2。

50 〔清〕阮元等修，江藩等纂，《廣東通志》，卷190，〈藝文略二〉，頁3474-3475。

51 戚昕，〈16-19 世紀中葉的女性與出版〉（濟南：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碩士論文，2013）。又學者曾整理 104 種明清女性詩集，發現出資刊刻者大多為男性親友（或藏書家），僅有 4.8% 是由女詩人自行集資，1.9% 是女性友人幫忙刊刻。見張聆雨，〈清代

版者「謚園」，我們目前尚未得見相關史料，然從書中的序言及原標題「菴猗女史李氏手著」等推測，《讀史管見》之初版有可能為家刻本。<sup>52</sup>高彥頤研究 17 世紀江南才女時曾提到，家刻是一種將家庭文化資本轉化為聲望或賺取利潤的手段，其經營可以是因特定項目而僱請一組游走的刻工，而這些書本有的也會在書鋪出售。書籍生產於家庭，意味著知識生產地的轉移，因此家刻促使了婦女與學問結合成新的關係，女性不離開家庭，也能進入印刷與知識生產的世界。<sup>53</sup>而這樣的出版印刷方式，使得這些婦女有機會成為作者、讀者或學者（甚至刊刻者）。李晚芳未曾留下詩詞著作，她的作品無法被收入明清時期為數不少的婦女詩文合集，其名不顯，然《讀史管見》的出版與印刷，讓居於廣東村落的她，著作得以流通閱讀，正是一個因出版印刷而進入知識流傳圈的例子。

## 二、《讀史管見》在日本的翻刻

《讀史管見》在日本出版的時間，以及校訂者池內陶所當時的職務與校訂之地點，據和刻本序中署名：「安政三年丙辰之歲，授衣之月，華頂王府侍讀池內奉時撰，并書於如射書院」，<sup>54</sup>可知具體時地。以下簡述池內之生平與著述，並闡釋和刻本《讀史管見》相關之出版問題。

池內陶所（1814-1863），姓源，名奉時，字士辰，號陶所，知恩院尊超親王賜名為「大學」，故又稱為池內大學，別號「夢花逸史」。池內為幕末儒者，出生於京都商家，八歲從學於貫名海屋（菘翁，1778-

---

女性著述出版途徑考》，收入南京大學古典文獻研究所編，《古典文獻研究（第十五輯）》（南京：鳳凰出版社，2012），頁 146-167。

52 洗玉清稱 1786 年出版的《女學言行纂》為家刻本，見氏著，《廣東女子藝文考》，頁 6。

53 Dorothy Ko, *Teachers of the Inner Chambers: Women and Culture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38-39. 中譯本見高彥頤著，李志生譯，《閨塾師：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頁 40-41。亦可參戚昕，〈16-19 世紀中葉的女性與出版〉，第二章「以家族為紐帶的出版活動」。

54 [日]池內陶所，〈刻讀史管見敘〉，收入李晚芳，《讀史管見》，卷 1，頁 3a。

1863)，<sup>55</sup>亦曾入龍野將監門下習醫。後其專心從貫名習儒，其學術被歸為「儒學折衷派」，以書法、詩文聞名於世。<sup>56</sup>

池內與王府關係密切，德川齊昭曾題贈其「如射書院」匾額，如射書院可能為池內的私塾。<sup>57</sup>天保二年（1831），池內年十八歲，出仕於知恩院尊超親王，隔年為近侍；後弘化四年（1847）任青蓮宮尊融法親王之侍讀。<sup>58</sup>校訂《讀史管見》時，他正擔任此職。嘉永六年（1853），美國使節培里（Matthew Calbraith Perry, 1794-1858）請求互市，水戶藩主德川齊昭（1800-1860）曾針對外交問題召詢之，池內作「攘夷論」，主張在大阪設立砲台，以守京城。幕末因與梁川星巖（1789-1858）<sup>59</sup>、梅田雲浜（1815-1859）、賴三樹三郎（1825-1859）同支持攘夷，被評為「惡謀の四天王」之一，安政五年（1858）掃蕩尊攘派時，池內因自首而得從輕處分，隔年八月被驅逐出江戶，後浪居大阪，委身於河內屋書肆。<sup>60</sup>由於人們以為他在安政大獄時自首變節，文久三年（1863）池

55 貫名菘翁，名芭，字君茂，號海屋，鑽研經史，且為詩人、畫家、書法家，書法聞名於世，其書齋稱為須靜堂。參〔日〕米田彌太郎，〈貫名菘翁と池内陶所〉，《書論》第17号（1980，大阪），頁86-87。

56 關於池内陶所之生平，參米田彌太郎，〈貫名菘翁と池内陶所〉，《書論》第17号，頁86-96；米田彌太郎，〈池内陶所の江馬信成あて書簡より——貫名菘翁のことども——〉，《書論》第22号（1983，大阪），頁140-148。可惜其研究中，並未提及池内校刻《讀史管見》一事。

57 中國「書院」的概念，在江戶時代隨著朱子學、陽明學傳入日本；1640年左右，日本有人開始把私塾稱作書院，書院漸次展現學校和出版機構的性質。參鄧洪波，《中國書院史》（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5），頁672。另有關東亞書院與文化交流，參〔日〕吾妻重二，〈文化交渉与东亚世界的书院〉，《東アジア文化交渉研究別冊》第8号（2012，關西），頁41-48。

58 米田彌太郎，〈池内陶所の江馬信成あて書簡より〉，頁141。

59 長於漢詩，編有《清六大家絕句鈔》。

60 文久二年（1862），池內與阪上大業（1810-1867）等人曾乘船體驗赤壁遊，著作有〈前赤壁集字詩十二律并引〉與〈後赤壁賦集字詩十五律並引〉等詩，詩中提到「因思余曾以事南遷，于今四年」，即指安政大獄一事。參〔日〕池澤滋子，《日本の赤壁會和壽蘇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頁8、134、167。

內於大阪難波橋遇刺身亡，<sup>61</sup>得年僅四十九，葬於大阪上本町大福寺。<sup>62</sup>

池內藏書豐富，約 4,820 餘卷，安政六年（1859）時有 2,498 卷被幕府沒收。<sup>63</sup>由其藏書目錄中可見經、史、子、集類之漢籍，例如經部有《四書大全》、《五經大全》、《周易》、《十三經註疏》、《孝經》；史部如《通鑑記事本末》、《通鑑綱目》、《史記》、《元史》、《明記記事本末》、《台灣鄭氏記事》、《清三朝事略》；子部為《韓非子》、《淮南子》、《荀子》、《管子》、《晏子春秋》、《孔子家語》、《大學衍義》；集部如：《唐宋八大家》、《陶淵明集》、《蘇東坡集》、《浙西六家詩抄》、《唐詩選》、《唐才子傳》、《揚州畫坊錄》、《明儒學案》、《甌北詩話》、《曝書亭文集》、《念一史彈詞》等。另外，與日本相關者如：《大日本史》、《日本地誌提要》、《日本雜事詩》、《水戶歷代碑誌》等。<sup>64</sup>

池內對於漢學頗為心儀，曾言：「世上之奇書，多出於西土。」<sup>65</sup>在校訂漢籍方面，除了《讀史管見》，在此之前，他還曾校訂過以下書籍：與賴山陽之季子賴三樹三郎借崇蘭館所藏《醉古堂劍掃》12 卷原本校刻之，本書為明代陸紹珩原著（天啟四年，1624），在幕末至明治時代流傳甚廣。<sup>66</sup>嘉永六年（1853）與貫名海屋等共同參與《浙西六家詩鈔》6

61 見《鞅掌錄》，卷 1，頁 366，收入〔日〕早川純三郎、岩崎英重編，《會津藩廳記錄 原題公武御達並見聞集》（東京：日本史籍協會，1918-1926）。唯其記載「池田」大學應為「池內」。另可參黃遵憲，《日本國志》（臺北：文海出版社，1968），卷 8，頁 219-220；〔日〕德富猪一郎，《近世日本國民史——文久大勢一變·下篇》（東京：民友社，1934），頁 510-511。

62 米田彌太郎，〈池內陶所の江馬信成あて書簡より〉，頁 1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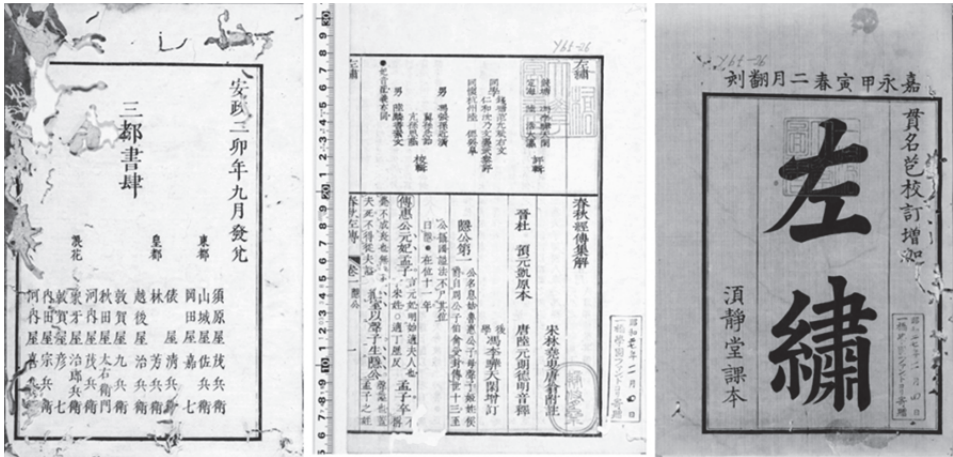
63 米田彌太郎，〈貫名菘翁と池内陶所〉，頁 90。

64 池內陶所，《如射書院藏書目錄》（書內頁標示《誦芬齋藏書目錄》，京都府立總合資料館藏）。池內藏書約近 900 種。感謝早稻田大學飯山知保教授協助取得此目錄。

65 參池內奉時（陶所），〈刻醉古堂劍掃敘〉，收入〔明〕陸紹珩，《醉古堂劍掃》（嘉永六年〔1853〕和刻本），頁 1a，書影見「江戶後期詩人たちの周辺」，<http://cogito.jp.net/kanshi/mado/suikodokenso.html>（2015 年 3 月 19 日擷取）。

66 參「江戶後期詩人たちの周辺」，見 <http://cogito.jp.net/kanshi/mado/suikodokenso.html>（2015 年 3 月 19 日擷取）。

卷的校訂刻印，嘉永七年（1854）貫名海屋翻刻《左繡》30卷附《春秋經傳集解》30卷（此為貫名氏須靜堂課本，見圖四），池內覆校之。



圖四 《左繡》書影，一橋大學藏

資料來源：全國漢籍データベース（日本所藏中文古籍數據庫），  
<http://kanji.zinbun.kyoto-u.ac.jp/kanseki?record=data/FA002010/tagged/910031002.dat&back=1>.

校訂《讀史管見》後五年，文久元年（1861）池內並協助貫名海屋覆校趙翼（1727-1814）《廿二史劄記》36卷等。<sup>67</sup>可見在上述十年之內，他曾參與校刻6部漢籍（期間還曾歷經安政大獄），積極投入。

池內在《讀史管見》序中，曾曰：

嗚呼！龍門史家之巨擘，古今之至文，而其所嫌者，惟未聞君子之大道耳。茲以史公之才學文章，修正誼明道之訓，得若董子，則其是然自不至謬於聖人矣。<sup>68</sup>

67 參中山步，〈和刻本清人著述研究〉，頁46、50；<http://ci.nii.ac.jp/ncid/BB00932348>（2014年11月1日擷取）。

68 池內陶所，〈刻讀史管見敘〉，收入李晚芳，《讀史管見》，卷1，頁1b-2a。



亦即感嘆大史家司馬遷並未堅守儒家思想，以其才學，若能如董仲舒那樣獨尊儒術，其論大道非先黃老而後六經，就不會被評為違背孔孟、「是非謬於聖人」了。由此亦可見池內對儒學的景仰。日本「儒學折衷派」的義理折衷宋明諸家，後來發展為考證派。幕末到明治初期，儒學為日本學術思想的主流之一，18世紀後半葉之後，日本儒學逐漸走向「經世學化」，慢慢普及於武士階層，折衷派學者利用朱子學回應現實政治的社會問題，他們抱有強烈的實踐熱誠，對他們來說，學問的目的不在學問本身，而是在於「治國安民」。<sup>69</sup>池內即為其中一例，他入侍親王，提供政治諮詢，幕末他急於呼籲「攘夷」，同時也積極校刻出版文史漢籍。而更由於近世日本沒有如中、韓之制度化科舉，其儒學知識之學習與傳道，不一定會與社會、政治責任緊密結合，<sup>70</sup>因此，像池內這樣學習經史、服務政治，更凸顯儒學折衷派學者對於知識的熱誠與政治社會的責任感。

接著我們考察和刻本《讀史管見》校刊出版之相關問題。池內陶所曾言及刊刻本書的緣由：「余舊藏一本，而人之借求者多，不能遍應其求，遂覆刻以置諸家塾。」<sup>71</sup>也就是說，想瀏覽《讀史管見》一書的人不少，他刻此書的目的，是為了眾人閱讀之便與他的私塾教育。他認為閱讀本書後，「讀者由是以長其識見，則一百三十卷，迎刃而解矣」，<sup>72</sup>對於《史記》將更能通解。他讚許李晚芳的史評：「辭義穩雅，評騭精細，可為讀史之彀率矣。」<sup>73</sup>亦即稱讚本書之評論，細緻精準，可作為讀史者之參考準則。池內還特別提到本書作者身為女史的特殊性：

69 [日] 辻本雅史著，田世民譯，〈十八世紀後半期儒學的再檢討：以折衷派、正學派朱子學為中心〉，收入張寶三、徐興慶編，《德川時代日本儒學史論集》（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4），頁175-185。

70 參辻本雅史著，田世民譯，〈談日本儒學「制度化」——以十七至十九世紀為中心〉，《臺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第3卷第1期（2006，臺北），頁257-2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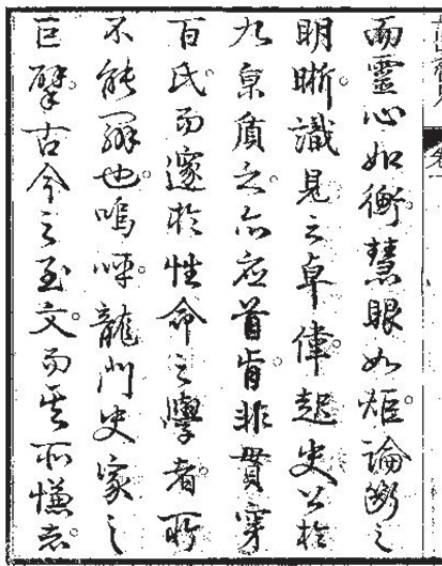
71 池內陶所，〈刻讀史管見敘〉，收入李晚芳，《讀史管見》，卷1，頁24。

72 池內陶所，〈刻讀史管見敘〉，收入李晚芳，《讀史管見》，卷1，頁2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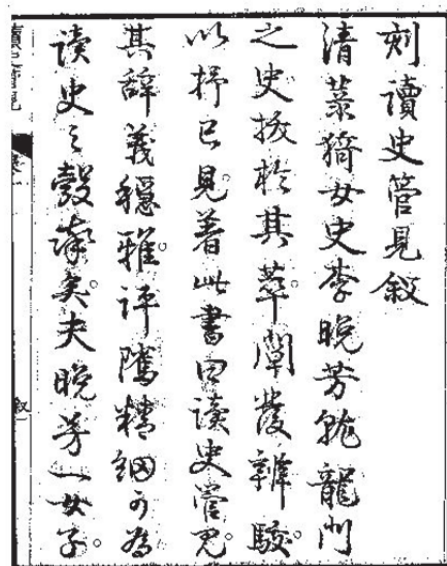
73 池內陶所，〈刻讀史管見敘〉，收入李晚芳，《讀史管見》，卷1，頁1a。

夫晚芳一女子，而靈心如衡，慧眼如炬，論斷之明晰，識見之卓偉。起史公於九泉質之，亦應首肯。非貫穿百氏，而邃於性命之學者，所不能關也。<sup>74</sup>

認為晚芳以女性之靈性慧眼著之，其觀點即使是司馬遷也應能認同，她的評論若不是曾博覽群書，實難做到。雖然他說史公之巨擘「豈容區區一女子之指摘也哉」？然又曰：「抑女子之具有慧性，弄筆墨、工詞翰者，世不為乏其人。今晚芳鍼綫餘事，為此著述，真巾幗而鬚眉者歟。」<sup>75</sup>對於李晚芳的著述，仍給予高度的評價。（書影見圖五）



ing University Library Collection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Peking University Library Collection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圖五 《讀史管見》（安政三年本）池內陶所敘書影，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資料來源：「明清婦女著作數字計劃」，<http://digital.library.mcgill.ca/mingqing/chines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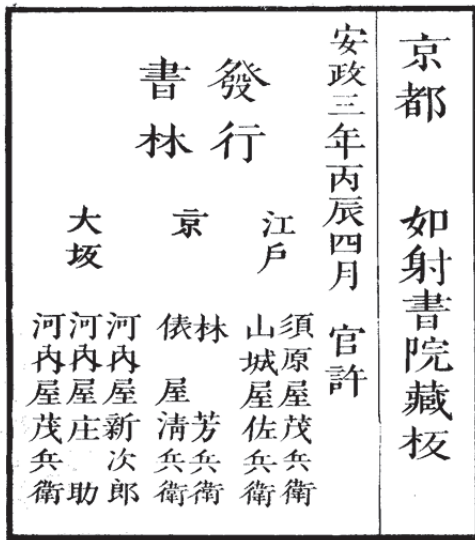


臺灣大學學術  
期刊資料庫

74 池內陶所，〈刻讀史管見敘〉，收入李晚芳，《讀史管見》，卷1，頁1。

75 池內陶所，〈刻讀史管見敘〉，收入李晚芳，《讀史管見》，卷1，頁1b-2b。

在印刷出版方面，本書共分為三卷六冊，封面題為「清 菖猗女史李晚芳著」、「日本陶所池內先生校訂」、「安政三年丙辰秋翻刻」、「浪華書林 羣玉堂製本」。刊記（即中國所稱牌記，今日稱版權頁）註明：「京都 如射書院藏板」、「安政三年丙辰四月 官許」（見圖六）。



eking University Library Collection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圖六 《讀史管見》（安政三年本）刊記書影，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資料來源：「明清婦女著作數字計劃」，<http://digital.library.mcgill.ca/mingqing/chinese/>.

首先，本書既非官刻，也非坊刻本，而是屬於「私刻」。日本書籍史家 Peter Kornicki 指出，江戶時代私刻的書籍，或者由於該書有問題，政府不允許隨意買賣，或者因出版者希望能夠掌握整個出版與銷售的過程而私刻。<sup>76</sup>其次，本書「刊記」註明為「如射書院藏板」，所謂的「藏板」，乃是特別標示持收藏書板者，有時也可能標示刻板者，這也就是



<sup>76</sup> Peter Kornicki, *The Book in Japan: A Cultural History from the Beginnings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eiden: Brill, 1998), p. 149.

本書之發行權，此在 18 世紀的日本頗為普遍，特別是學校與寺院。然由於刻版、印刷與裝訂開銷往往所費不貲，又或者為了讓書籍能夠銷售更廣，也常有私刻者跟出版商或書商合作的情形。《讀史管見》由浪華羣玉堂印製，在江戶、京都與大阪三大城市發售，有江戶的須原屋茂兵衛與山城屋佐兵衛，以及京都林芳兵衛與俵屋清兵衛，還有大阪河內屋新次郎、河內屋庄助、河內屋茂兵衛等「書林發行」，可能就是基於上述的情形。但明治印本的《讀史管見》，往往已不見「如射書院藏板」字樣，真正原因目前不得而知，有可能由於池內已經過世，出版商據有版木，或者出版商已向繼承人購買了版權，甚或是盜版。<sup>77</sup>另外，可惜我們沒有本書書價的訊息，難以觀察本書在當時日本之販售。

至於羣玉堂的出版狀況，目前所知，它曾出版漢籍如：（宋）真山民撰，《真山民詩集》（文化七年〔1810〕刊）；（明）朱逢吉編，《牧民心鑒解》（嘉永六年〔1853〕刊）；（明）孫傳庭撰、日人桑原忱選，《孫忠靖公文抄》（明治四年〔1871〕刊）等，以及準漢籍（日人用漢文編寫的書籍）如廣瀨淡窓撰，《遠思樓詩鈔》（天保八年〔1837〕刊）；高井蘭山翁編譯、北齋主人畫，《新編水滸畫傳》（天保九年〔1838〕刊）；帆足萬里撰，《入學新論》（天保十五年〔1844〕刊），<sup>78</sup>以及橫田乾山（1774-1829）編的《戰國策正解》（文政九年序刊），與荻生徂徠（1666-1728）譯注之《孫子國字解》（寬延三年序刊）。<sup>79</sup>

77 以上日本私刻書籍發展概況，詳參 Peter Kornicki, *The Book in Japan*, pp. 149-153. 他認為通常在封底列為最末的才是真正的出版者，所以有時最後會寫上「板」一字，代表他們擁有版木。見 Peter Kornicki, *The Book in Japan*, p. 194. 若如是，河內屋喜兵衛可能在明治年間曾擁有本書的版權，見上海華東師範大學藏《讀史管見》封底。然目前所見許多明治印本均無註明版權，僅有販賣書商的訊息。近世大阪出版業中，出版與販售往往合一，其中出版行會（本屋仲間）在此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日〕山口佳代子，〈近世大阪における出版業界の展開——大阪本屋仲間の視点から〉，《歴史評論》第 547 号（1995，東京），頁 43-59。關於 17-19 世紀日本版權概念，參 Peter Kornicki, *The Book in Japan*, pp. 242-251.

78 以上北京國家圖書館藏。

79 見 Nozomu Hayashi, and Peter Kornicki, eds., *Early Japanese Books in Cambridge University*

值得說明的是，「須原屋茂兵衛」這樣的屋號，並不是商人的姓氏，而是出版商或書商的名稱，通常是以之前經營這個商號的家長為名。<sup>80</sup>其中，須原屋茂兵衛在 18 世紀末至 19 世紀初的江戶，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出版商，例如目前英國劍橋大學圖書館所存 2,000 部和刻本中，即有 332 種是經此出版或銷售。且江戶末期雖然是須原屋茂兵衛相對較沒落的時期，但是他們還是持續印書、發行。<sup>81</sup>另，延享四年（1747）發跡的河內屋喜兵衛，在江戶到明治時期是大阪最重要的出版商之一，<sup>82</sup>該集團旗下一支河內屋茂兵衛新興於 19 世紀，握有高比例的出版權，<sup>83</sup>大阪河內屋茂兵衛與江戶須原屋茂兵衛這兩家書商，均曾發行不少漢籍，臺灣大學圖書館即有一些收藏。<sup>84</sup>

《讀史管見》一書曾通過官方審查，於安政三年丙辰（1856）四月得到官許，當年秋翻刻。通過審核之後，約四、五個月正式發行。在此所謂的「官許」，乃是特別強調由政府而非出版行會（本屋仲間）發出的出版許可。<sup>85</sup>學者曾指出「官許」為明治年間的特殊用語，江戶期間通常只有官版、藩版（由大名主持出版）的書才會偶用此一詞彙。<sup>86</sup> 19 世紀京都地區書籍的檢查，一般是由該地的出版行會負責，主事者稱為「行司」或「行事」，他們會查明是否為重版或類版，然後再發給證

---

*Library: A Catalogue of the Aston, Satow, and Von Siebold Collec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357-358.

80 Peter Kornicki, *The Book in Japan*, p. 174.

81 Peter Kornicki, *The Book in Japan*, pp. 211-212.

82 關於河內屋出版商本家與分支之間的關係，參〔日〕坂本宗子，〈近世後期大阪本屋仲間における別家衆の動向——河內屋一統を中心に〉，《大阪の歴史》第 57 号（2001，大阪），頁 21-59。

83 從 1818 到 1870 年，河內屋茂兵衛在大阪佔有出版權從 32% 升到 54%，第一代負責人 1863 年過世，所以本書乃第一代時期所發行。參 Peter Kornicki, *The Book in Japan*, pp. 221-222.

84 參張寶三主編，〔日〕住吉朋彥編輯，蔡碧芳助編，《臺灣大學圖書館藏珍本東亞文獻目錄·日本漢籍篇》（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8），頁 27-28。

85 Peter Kornicki, *The Book in Japan*, p. 359.

86 Peter Kornicki, *The Book in Japan*, p. 359.



明。<sup>87</sup>京都書林仲間紀錄中，文久元年（1861）檢查重版資料，曾列有《讀史管見》一書，但未註明作者與卷數（宋人胡寅也著有同名書），然此書名接續在同一出版社刻印的《左繡》之後，為李晚芳本書的可能性頗大。<sup>88</sup> 1842年京都的出版行會被幕府解散，審查工作由幕府的學問所接管，至1853年雖然京都出版行會重組，仍由學問所負責審查。官方還特別提醒他們，禁止出版販售有關西方國家的謠言，或者進口中國的色情文學。<sup>89</sup> 本書可能是在學問所負責審查期間發行。

在製版方面，明治維新以前和刻本漢籍主要是用整版（雕版）方式印製。其在版本學上的重要特點之一是通常保留了底本的原貌，<sup>90</sup>往往是以原本覆刻的方式出版。江戶時代漢籍的需求量大增，但從中國到日本的漢籍有所控管，數量有限，價格昂貴，因此有在日本翻刻的情形。<sup>91</sup> 特別是寬政年間到幕末時期，由於考證學的影響，常以善本為底本翻刻。<sup>92</sup> 所謂的覆刻（「覆せ掘〔彫〕り」）是一種複製的技術，基本上依照底本原樣翻雕，日本人通常以較早的刻印本直接貼在書板上覆刻，室町時代即用這種刻書方法複製宋、明版漢籍，到了德川時代更加普及。<sup>93</sup> 有趣的是，這項技術可能在中國宋代便已存在，但至清末才被廣泛使用，論者曾提到清末駐日公使黎庶昌（1837-1896）透過楊守敬（1839-1915）之協助，編刻了《古逸叢書》，當時他選擇流傳在日本的宋元本、古寫

87 Peter Kornicki, *The Book in Japan*, p. 182. 亦可參〔日〕松田美由貴、日下幸男，〈京都本屋仲間記録『上組濟帳標目』の分析〉，《龍谷大学佛教文化研究所紀要》第44号（2005，京都），頁289-304。

88 〔日〕宗政五十緒、朝倉治彦編，《京都書林行事上組重板類板出入濟帳》（東京：ゆまに書房，1977），頁696。

89 Peter Kornicki, *The Book in Japan*, pp. 196, 343, 348-349.

90 趙飛鵬，〈傳播與回流——「和刻本」漢籍的淵源與價值〉，收入潘美月、鄭吉雄主編，《東亞文獻研究資源論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7），頁238。

91 大庭脩，〈江戸時代における中国文化受容の研究〉，頁109。

92 參〔日〕中村幸彦，〈和刻本〉，收入〔日〕水田紀久、賴惟勤編，《日本漢學》（東京：大修館書店，1968），頁260-271。

93 Peter Kornicki, *The Book in Japan*, p. 49.

本，並請日本的木村嘉平等高手來影寫覆刻，而清末民初許多藏書家也熱衷此道，嘉業堂的劉承幹等人，即藏有不少覆刻書籍傳世。<sup>94</sup>

對照於清代刻本，我們發現安政年間《讀史管見》在日本翻刻時，基本上是以嘉慶印本為版樣，僅稍稍改變版式。本書原為三冊，安政版分為六冊，且刪掉原書的圖像與像贊，版型比較窄，每半頁從十行改為九行，每行同樣為二十四字，所以每行開頭與尾端的字與嘉慶印本相同，亦無行格，並保留原有的夾註、圈點、眉批與旁批，另在原眉批上加框，版心同為白口，無原本的「棊猗園」字樣，版框改為上下單邊，左右雙邊。本書保有原漢籍之句讀，加上「返點」，更方便日人閱讀。池內陶所不僅收藏此書，在校訂翻刻時還將此書加上訓點，對本書在日本的閱讀與傳布，裨益良多。

### 三、《讀史管見》之流傳

江戶時代日本與中國貿易僅限於長崎，長崎置有長崎奉行，管理所有的外國貿易，當時出現購買書籍的機構，有時人們還從江戶向長崎的中國商人訂貨。<sup>95</sup> 1826年漂到駿河下吉田的「得泰號」上，清人朱柳橋曾與野田秋嶽筆談，朱柳橋即曰：「我邦典籍雖富，邇年以來裝至長崎，已十之七八，貴邦人以國字譯之，不患不能盡通也。」<sup>96</sup>可見當時漢籍輸入日本之熱絡。

而為了杜絕基督教思想傳入日本，在鎖國政策底下，自寬永七年（1630）開始，進行進口書籍檢查。書籍上岸之後，中國商船要先呈報泊載書目，也就是齎來書目。日本官方編輯「大意書」，一一記錄作者

94 黃永年，《古籍整理概論》（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頁36-37。

95 [日]高田時雄，〈「日本所藏中文古籍數據庫」介紹〉，《漢學研究通訊》第29卷第1期（總113期；2010，臺北），頁33-37（見頁34-35）。

96 《得泰船筆語》，收入[日]田中謙二、松浦章編著，《文政九年遠州漂著得泰船資料》（吹田：關西大學出版部，1986），頁104。

姓名、序文、該書目錄、卷數、書況及可能違禁的內容等，除了幕府訂購的書籍以外，其他書籍都需經過「書物改役」檢查之後，由將軍等幕府人物、地方官員優先取得，其餘由「書物目利」對書籍估價，再由官方指定之批發商購買，流入京都、大阪和江戶等書商手中。由於書目檢查曠日廢時，寶曆六年（1756）後規定只有初次輸入的書籍才需要編寫大意書。<sup>97</sup>

《讀史管見》這本書如何被挑選而傳入日本？可惜限於史料，除了幕府所訂購的書籍，我們很難知道當時個別唐船挑選漢籍入日本的理由與細節，<sup>98</sup> 17世紀與18世紀末的相關記載，或許可以提供些許訊息。元祿八年（1695）船商辯解為何輸入禁書《帝京景物略》時說：「於本國出船之時，僅覽書名而已，未及細察內容，以為皆尋常之書，故而持來。」明和八年（1771）輸入《天學初函》的船主也曾辯稱：「凡唐國貨主書肆中現存之書，盡數攜來，接受目錄後，即行啟航。」<sup>99</sup>可見商人進口書籍時往往僅見目錄，書籍被挑選的偶然性可見一斑。<sup>100</sup>宋人胡寅（1098-1156）即有一書同名《讀史管見》（又稱《致堂讀史管見》），三十卷，江戶時代曾傳入日本，一些大意書中均有提及，<sup>101</sup>李晚芳的書或被視為同一本書而被引進。實際上，兩書的篇幅差異很大，內容主題也不同，胡寅一書乃讀司馬光《資治通鑑》而作，非針對《史記》所發，

---

97 詳參大庭脩，《江戶時代における唐船持渡書の研究》，頁77；大庭脩，《江戶時代における中国文化受容の研究》，頁85-99、396-405。

98 日本內閣文庫藏有《讀史管見》，來自昌平坂學問所，顯見官方亦曾收錄這本書，但收藏的具體時間待考。見「日本所藏中文古籍數據庫」<http://kanji.zinbun.kyoto-u.ac.jp/kanseki?record=data/FANAIAKAKU/tagged/2059005.dat&back=1>（2010年9月2日擷取）。

99 轉引自大庭脩，《江戶時代における中国文化受容の研究》，頁47-48。

100 大庭脩亦認為這些船商不精通圖書行情，絕大多數的漢籍可能是在偶然機會輸入日本。《江戶時代における中国文化受容の研究》，頁47-48。

101 天明六年（1785）寅十番船大意書中其書目中即有胡寅之《讀史管見》一部二套16本。見〈寅十番船齋來書目〉、〈寅十番船大意書〉，收入《船主沈敬瞻關係資料》，收入大庭脩編著，《安永九年安房千倉漂着南京船元順號資料》（吹田：關西大學出版部，1991），頁122、132。

本不應混淆，極有可能當時進口書目並未標示作者，或者商人只知書名未見內容，以致混淆。

另值得注意的是，《史記》是江戶時代儒學教育的重要內容之一，其全本、選本、工具書與評論等等，在江戶時代均曾輸入日本，<sup>102</sup>因此李晚芳《讀史管見》一書，亦可能是書商見到與《史記》相關的作品，即認為富有商機。特別是史評類，如明代李光縉（1549-1623）增補、凌稚隆（生卒年不詳，約明萬曆年間）輯校的《史記評林》130卷，在江戶時期也曾銷入日本，<sup>103</sup>多次被翻刻，至明治期間尤盛，例如京都世裕堂明和七年（1770）刻本，東京玉山堂明治二年（1869）刻本，東京九春堂明治十六年（1883）刻本等版本。江戶期間刊刻者，多為寬文、天明、寬政時期，未見安政年間刊本，<sup>104</sup>也許《讀史管見》同樣是對《史記》之評論，而被書商選中。

女性著作在中國已屬少數，東傳日本漢籍的女性作者亦不多見，<sup>105</sup>被翻刻的機會更是少之又少，由此足見李晚芳《讀史管見》和刻本的特殊性。目前所見和刻漢籍與女性相關者，多為女性詩作與女教書，如安政二年出版的《歷代名媛詩鈔》，<sup>106</sup>女教書在江戶時代多次被翻印，昌

102 參賈啟勳，《〈史記〉與日本文化》（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89），頁50-54。

103 見《齋來書目》寬政六年（1794）寅貳番南京船書籍名目，以及長崎交易會所《書籍元帳》弘化五歲（1848）申四月書籍元帳，收入大庭脩，《江戶時代における唐船持渡書の研究》，資料篇，頁252-521。

104 關於日本所見《史記評林》的版本異同與其間脈絡，詳參〔日〕山城喜憲，〈《史記評林》諸版本志稿〉，《斯道文庫論集》第20輯（1983，東京），頁345-392。關於本書的刊刻，見〔日〕戶川芳郎，〈『史記評林』の版刻について〉，《二松：大学院紀要》第10号（1996，東京），頁149-188。

105 《舶載書目》中所列可見《古今女史》（1695年輸入）、《閨貞集》（1703）、《名媛詩歸》（1723）、《古今名媛詩歸》（1799）、《彤管新編》（1726）、《午夢堂詩》（1779）、《本朝名媛詩抄》（1783）、《名媛尺牘》（1841）等書。以上為張伯偉整理自大庭脩《江戶時代における唐船持渡書の研究》資料編，見張伯偉，〈明清時期女性詩文集在東亞的環流〉，《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年3期（上海），頁95-106（見頁100）。

106 見〔日〕小林善八，《日本出版文化史》（東京：青裳堂書店，1978），頁742。

平坂即刻印有明仁孝文皇后《內訓》與明慈仁太后《女訓》等。<sup>107</sup>又明代胡氏文會堂本劉向《列女傳》，到德川幕府時期更是被大量翻印，京都的上村次郎衛門、葛西市郎衛門都曾刊印過。<sup>108</sup>而檢閱池內藏書目錄，其中與女性相關的書籍很少，僅有《女訓》與《內訓》、〈真淑婦人碑〉（嵇翁先生祖母）等，池內對女性著作可能並不特別有興趣。

李晚芳《讀史管見》翻刻之時，為日本開港後兩年，江戶時代的尾聲。池內並未說明本書取得的管道與時間，在《商船載來書目》、《經籍訪古志》、《古文舊書考》等日人所編目錄均未見本書的紀錄。<sup>109</sup> 17至18世紀以來，到日之唐船大體以江蘇、浙江、廣東、福建等地為主，<sup>110</sup>李晚芳是廣東順德人，她的《讀史管見》可能在廣東刻印，藉由廣東船傳入日本。和刻本《讀史管見》附有嘉慶丁丑二十二年（1817）的序，本書校刻乃以嘉慶印本為底本，該書最早傳入日本的時間應為19世紀上半葉，亦即《讀史管見》最遲在出版38年之後於日本覆刻。由於只是推估，該書從嘉慶印本到發行和刻本，也有可能不到30年。<sup>111</sup>

107 見〈昌平坂御官板書目〉，收入書誌研究会編纂，《近世後期書林藏版書目集》（東京：ゆまに書房，1984），下卷，頁161。

108 且在此基礎上，日本也刻印有不少本國女誠書籍，參王慧榮，〈劉向『列女傳』在日本的流傳與影響〉，《或問》第22号（2012，吹田），頁87-93。當時日本國內對女性作者以及與女訓有關的漢籍需求，所牽涉到的印刷出版、書籍史，值得未來進一步深究。日本奈良女子大學已建置該校所藏江戶與明治時期女訓圖書影像資料庫，見奈良女子大學所藏資料電子画像集，<http://www.lib.nara-wu.ac.jp/nwugdb/jindex.html>（2015年1月20日擷取）。

109 《商船載來書目》（1804），國立國會圖書館藏，收入大庭脩，《江戶時代における唐船持渡書の研究》，頁659-739；〔日〕澁江全善、森立之，《經籍訪古志》，收入《古書題跋叢刊》33（北京：學苑出版社，2009據清光緒十一年〔1885〕印本影印）；〔日〕島田翰，《古文舊書考》，收入賈貴榮輯，《日本藏漢籍善本書志書目集成》第3卷（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據日本東京民友社明治三十七年〔1904〕聚珍排印本影印）。

110 大庭脩著，徐世虹譯，《江戶時代日中秘話》（北京：中華書局，1997），頁24-25。

111 19世紀有許多漢籍在出版後數年內即傳入日本，也有在短期之內即有和刻本者。例如《海國圖志》於1847年出版，約1851年傳入日本，1854年即有和刻本。見大庭脩，《江戶時代における唐船持渡書の研究》，表第六，〈唐船持渡書の刊年舶來年比較表〉，頁



18 世紀末至 19 世紀傳入日本的漢籍，實際上以小說為多，並且對日本小說的發展影響很大。<sup>112</sup>然池內對經史的興趣極高，目前所知他所校刻的漢籍中，即有著名的趙翼《廿二史劄記》。上述他的藏書目錄亦可見許多經、史類漢籍，而在史評與史論方面則收有《史通通釋》、《史綱評要》、《讀史管見》（兩筆同樣書名，由於本書目未著作者，猜測可能分別為李晚芳與胡寅的作品）等書，然其中並無《史記評林》。池內活動於江戶末期，他校刻與收藏之史部漢籍，呈現了幕末學者對中國史學的興趣與研究。考察江戶時代輸入的漢籍，會發現在史學方面，除了二十四史，尚有《通鑑綱目》、《通鑑答問》、《東華錄》，<sup>113</sup>以及《唐鑑》、《續通鑑綱目》等。<sup>114</sup>《舶載書目》正德元年（1711）也記載了船舶書目中有《歷代史纂左編》百四十二卷百冊、《歷朝綱鑑全史》七十卷三十冊、《皇明通紀》二十七卷十六冊等。<sup>115</sup>另外對輔國佐政有所助益的地方志，日人也頗有興趣，據統計，17 至 19 世紀中葉傳入日本的方志共約 1,245 部。<sup>116</sup>

其次，前述目前在中國大陸許多圖書館均可見和刻本《讀史管見》，本書又是如何西傳中國？明治維新以後，由於日本崇尚西學，對於漢籍的熱中稍減，許多漢籍回傳中國。<sup>117</sup>又清末以來不少中國商人、駐日使

238。最近松浦章發現《清嘉錄》一書在 1830 年 6 月於蘇州成書，從鄰近的乍浦出口，年底到達長崎，隔年 3 月即可見於江戶書市，至 1837 年有了翻刻本。見〔日〕松浦章，〈『清嘉錄』の日本舶載と和刻本の流布〉，《東アジア文化交渉研究》第 4 号（2011，關西），頁 373-389。

112 Peter Kornicki, *The Book in Japan*, p. 299.

113 以上見《官版書籍解題略》，收入《書目類編》（臺北：成文出版社，1978），頁 187-188，天保 15 年記載。

114 見《諸藩藏版書目筆記》，收入《書目類編》（臺北：成文出版社，1978），頁 240。

115 大庭脩，《江戶時代における中国文化受容の研究》，頁 38。

116 巴兆祥，〈17-19 世紀中葉中日書籍交流史的經濟學分析：以地方志為例〉，《清史研究》2008 年第 2 期（北京），頁 37-48。

117 彭斐章主編，《中外圖書交流史》（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頁 255-258。而 18 世紀即有中國人將佚失的漢籍帶回中國，例如 1772 至 1780 年間到長崎的浙江商人汪鵬（汪竹里），即發現日本翻刻的《論語集解義疏》等重要書籍。詳參〔日〕松浦章，

節、赴日考察人員、留學生至日本訪書，特別是駐日公使團，他們帶回的書籍也包括和刻漢籍。<sup>118</sup>這些書籍在 19 世紀下半葉的上海等大都市可以取得，且被視為有利可圖，<sup>119</sup>其中最著名的即是實業家岸田吟香（1833-1905）於 1878 年開始在上海經營的樂善堂藥房兼書店，他販賣銅版書與古漢籍、和刻漢籍，<sup>120</sup>亦自行翻刻和刻漢籍，甚至刻意將之挖除日式訓點，以配合中國市場之需。<sup>121</sup> 1870 年代，中日兩國來往的人員，除了商旅以外，還有許多文人學者、畫家等，對兩國的文化藝術交流影響頗鉅，這段時間中日書籍交流史的研究，值得深究。<sup>122</sup>

---

《江戶時代唐船による日中文化交流》（京都：思文閣，2007），頁 160-163、202-216。

- 118 參張偉雄，《文人外交官の明治日本：中国初代駐日公使団の異文化体験》（東京：柏書房，1999）；呂順長，〈清代赴日考察官紳日本訪書活動初探〉，收入王勇等，《中日「書籍之路」研究》（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頁 202-216；陳捷，《明治前期日中学術交流の研究》，第三部。
- 119 最近賴毓芝注意到 19 世紀下半以海為中心的日本書籍貿易，且發現 1880 至 1890 年代之間，大約有九個書店在《申報》上廣告販售日本書籍。見氏著，〈清末石印的興起與上海日本畫譜類書籍的流通：以《點石齋叢畫》為中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85 期（2014，臺北），頁 57-127。關於 1880 年代日本書籍傳入中國，以及各大城市經營日本圖書的書店情形，可參陳捷，《明治前期日中学術交流の研究》，第三部第一章。
- 120 詳參王寶平，〈一百多年前一個日本人的上海手記——岸田吟香的『吳淞日記』〉，收入王勇主編，《中國江南：尋繹日本文化的源流》（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6），頁 207-225；王寶平，〈岸田吟香出版物考〉，收入杭州大學日本文化研究所、神奈川大學人文學研究所編，《中日文化論叢——1997》（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9），頁 10-25。
- 121 陳捷，〈岸田吟香的樂善堂在中國的圖書出版和販賣活動〉，《中國典籍與文化》2005 年第 3 期（北京），頁 46-59。
- 122 關於藝術方面，參賴毓芝，〈伏流潛借——1870 年代上海的日本網絡與任伯年作品中的日本養分〉，《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第 14 期（2003，臺北），頁 159-242、245；〈清末石印的興起與上海日本畫譜類書籍的流通〉。陳捷，〈十九世紀七十、八十年代中國書畫家的日本遊歷〉，收入關西大學文化交涉學教育研究中心、出版博物館編，《印刷出版與知識環流：十六世紀以後的東亞》（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頁 435-454。書籍交流方面，除了上引王寶平、陳捷等關於岸田吟香的研究，另可參〔日〕川邊雄大，〈幕末明治真宗僧的漢籍受容——以松本白華和北方心泉為例〉，收入關西

李晚芳《讀史管見》一書究竟經由何種管道再度傳回中國，個別圖書館收藏的情形尚無法一一知悉，<sup>123</sup>而本文徵引的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書，乃是來自李盛鐸之收藏。<sup>124</sup>李盛鐸（1859-1934），江西德化人，號木齋，光緒十五年己丑（1889）進士，自幼喜藏書，於光緒五年（1879）左右在上海遇到岸田吟香，開始向其購買日本古刻、活字與舊抄本古籍。李又曾擔任出使日本國大臣，結識了日本目錄學家島田翰（1879-1915），因而購進不少稀見古籍。北京大學圖書館所藏的日本書籍，即大半來自其「木犀軒藏書」。李盛鐸過世後，其子李滂等在1940年將藏書售予北京大學，其中包括和刻漢籍623種，<sup>125</sup>《讀史管見》即為其一。<sup>126</sup>而我們從〈樂善堂發兌東洋本新舊書籍〉中列有菴猗女史李晚芬〔芳〕著《讀史管見》一書，<sup>127</sup>推測李盛鐸所藏的《讀史管見》，極有可能是購自岸田吟香，此可作為李晚芳《讀史管見》一書在中日之間流傳動向之一例。

---

大學文化交涉學教育研究中心、出版博物館編，《印刷出版與知識環流》，頁455-469。

123 目前所知，復旦大學所藏明治年間刻本：有「丁福寶讀書記」長方印、「復旦大學圖書館丁氏文庫」方印、「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書」方印，由此大略可追溯該書的收藏的源流。

124 《木犀軒收藏舊本書目》記載：《讀史管見》六冊，清李晚芳所著，安政三年刊，見李盛鐸藏並編，《木犀軒收藏舊本書目》（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據北京國家圖書館藏民國抄本影印），頁332。該書目將《讀史管見》誤植為《「漢」史管見》。

125 參王寶平，《清代中日學術交流の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05），頁409。北京大學圖書館編，《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李氏書目》（北京：北京大學圖書館，1956），〈引言〉，頁1-2。李玉，〈中日文化交流的歷史見證——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日本版古籍簡析〉，收入氏編，《北京大學圖書館日本古籍目錄》（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頁11-12。張玉範，〈李盛鐸及其藏書〉，收入李盛鐸著，張玉範整理，《木犀軒藏書題記及書錄》（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頁425-431。

126 見北京大學圖書館編，《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李氏書目》，頁139。《讀史管見》在目錄中被列為普通古籍，而非和刻漢籍。

127 收入〔日〕樂善堂主人（岸田吟香），《樂善堂書目》（東京大學總合圖書館藏），頁20。此書目卷首有光緒十至十一年（1884-1885）與光緒十三年（1887）之敘。筆者感謝李蘇書先生協助取得此資料。

## 餘論：文化交流與書籍史研究

近年來學界時興的書籍史研究，強調從書籍的「使用」而非「製造」的眼光，觀察書籍從寫作到出版，從印刷、發行流通到消費、閱讀的迴路，嘗試發掘文本與讀者之間的可能聯繫，認為以此更能看到書籍在社會文化中的意義。<sup>128</sup>本文追溯和刻本《讀史管見》在 19 世紀的出版流傳，即試圖考察本書的部分生命史。

盛清時期的中國出版業蓬勃發展，形成新的區域性出版中心，如成都、廣州等地，<sup>129</sup>江戶時代中日之間的貿易，一直都有廣東船的紀錄，<sup>130</sup>

《讀史管見》在 18 至 19 世紀中日印刷出版興盛，以及中日之間限定口岸與船隻、數量的特殊貿易方式下，輸入日本，經過翻刻，得以流通於日本書肆。由現今各大圖書館所存本書以和刻本為主，罕見嘉慶印本，推知至少於 19 世紀末到 20 世紀初上半葉周氏師古堂影印本出刊之前，中、日、韓讀者手中所閱讀的《讀史管見》多半是安政或明治年間的和刻本。<sup>131</sup>而池內陶所實為李晚芳《讀史管見》最重要的讀者之一，他收藏此書，又將之付梓出版，使得本書推廣至日本知識界。本書回傳近代中國，被一些藏書家購買珍藏，且收藏於知名圖書館；更由於數位化之便，這本藏於北京大學圖書館的安政年間和刻本《讀史管見》，在「明

128 Robert Darnton, "What Is the History of Books?" *Daedalus* 111, no. 3 (Boston, Summer 1982): 65-83. Roger Chartier, "Texts, Printing, Readings," in *The New Cultural History*, ed. Lynn Hunt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pp. 154-175. 歐美書籍史研究相關討論，可參秦曼儀，〈書籍史方法論的反省與實踐——馬爾坦和夏提埃對於書籍、閱讀及書寫文化史的研究〉，《臺大歷史學報》第 41 期（2008，臺北），頁 257-314。

129 Cynthia J. Brokaw, *Commerce in Culture*, pp. 10-11.

130 廣東船輸入書籍亦偶見記載，如 1682 年與 1753 年，見永積洋子編，《唐船輸出入品數量一覽 1637~1833 年》，頁 97、129。

131 目前所知，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與成均館大學尊經閣藏有此書，版本均為安政年間和刻本。

清婦女著作數字計劃」網站上，免費讓讀者隨時隨處閱讀。各大圖書館收藏和刻本《讀史管見》與數位化工作，使 18 世紀李晚芳閱讀、思考與寫作的軌跡，為今日研究者所知悉，和刻漢籍對中國讀者的影響實不應被忽略。

從印刷出版而言，過去西方學者對中國印刷術的發展存有偏見，認為中國沒有徹底從雕版印刷轉變為活字印刷，以致於缺乏如歐洲進入現代世界的動力；然雕版印刷實際上有其經濟效益與生產便利的優勢。<sup>132</sup>由和刻本漢籍的研究顯示，正由於使用雕版的便利與價廉，漢籍與漢文化，才得以在江戶時代快速地翻印流傳。清末中國的最新知識也利用此印刷製版方法流傳於國內，輸入日本，其中包括對世界的認識與最新科技的介紹。19 世紀中末葉，中日兩國雖然都開始利用西方新的印刷技術印製圖書，然而日人對清人著述的需求仍未減，和刻本漢籍至明治末期仍多見印本與重刊本，<sup>133</sup>並以整版雕刻的方式印製。

書籍在本研究案例中，是知識的承載物，是私塾的教材，也是流通的商品，更是文化交流的媒介。從本文討論的案例可以看到，清初才女的史評著作，渡海至日本，在日本因讀者的需求而重新翻刻。可惜礙於史料所限，我們目前無法掌握確切的日本讀者有哪些，但至少從池內的序言推知，初期可能是他的門生或友朋。池內來往文人多長於漢學與漢詩，例如前述漢詩家梁川星巖、漢學儒者梅田雲浜與著名漢學家賴山陽之子賴三樹三郎等人，都有可能讀過本書。本書至明治年間仍陸續發行，甚至增加至 13 個書肆販賣，可見潛在的市場。

值得一提的是，雖然書籍是中日文化交流史學者關心的議題之一，但由相關研究成果顯示，文化交流史與書籍閱讀史的最新研究取徑仍有待進一步融合。目前研究者往往從貿易與傳播的角度來思考書籍史，多僅將書籍視為商品，鮮少進一步探討這些書籍為何會流通於中日之間？

132 周啟榮試圖扭轉這樣的錯誤印象，見 Kai-wing Chow, *Publishing, Culture, and Power in Early Modern Chin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57-61.

133 中山步，〈和刻本清人著述研究〉，頁 44。



各自的閱讀大眾又為何者？這些書籍與流出／流入國的社會網路之間的關係，以及文化互動中書籍的「交流迴路」（communications circuit）等問題，都有待釐清。<sup>134</sup>例如學者曾注意到中日書籍交流中，地方志是重要的書籍類型之一，惜研究主旨僅探討輸日方志數量、販運管道以及售價與利潤，<sup>135</sup>未進一步追問明清時代方志刊印的數量之豐是否可能與輸入日本市場有關？還有日本書商心目中潛在的消費者與實際讀者是誰？此與中日兩國閱讀出版文化、學術風氣等關連何在？最後，如果討論書籍史過於強調貿易消費，可能會忽略 18 至 19 世紀書籍（及其內容）往往是藉由餽贈、借閱、集體閱讀或者朗讀的方式而流傳，不一定經由購買；而僅強調消費面向，作者、刻書者在販售以外的出版意圖，或可能被忽略。<sup>136</sup>

有關江戶末期中日書籍出版交流史中目前尚未能解決的問題，恐多出自於學界長期以來對 18 至 19 世紀中國出版史研究的忽略，<sup>137</sup>以致於

134 近年來高橋智教授提倡「古籍流通學」，強調從復原古籍、版本鑑定、典藏保管三方面來研究中國古籍，以此補充並整合過去日本書誌學研究的視野。參〔日〕高橋智，〈中國古籍流動史的確立を目指して〉，《中國古籍文化研究》第3号（2005，東京），頁5-15；〈古籍流通的意義：善本和藏書史〉，《中國典籍與文化》2010年第1期（北京），頁96-108。另中國古籍文化研究所編，《中國古籍流通學的確立：流通する古籍・流通する文化》（東京：雄山閣，2007），可惜其方向未觸及閱讀史之議題。

135 巴兆祥，〈17-19世紀中葉中日書籍交流史的經濟學分析〉。又范金民論及江南刻書業與書市的繁盛，以此解釋清前期中日長崎貿易龐大的書籍流通背景，或許由於史料之限，這些書籍是如何被選入唐船運送到日本，仍無以得知，見范金民，〈縹囊緬帙〉。

136 李仁淵從「作為行動的閱讀」、「讀者與讀物」、「閱讀、思想與社會」三方面，介紹西方閱讀史研究之課題，並提出一些中國閱讀史研究發展的可能性，有助於我們思考、定位問題與架構研究輪廓，見氏著，〈閱讀史的課題與觀點：實踐、過程、效應〉，收入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復旦大學中外現代化進程研究中心編，《新文化史與中國近代史研究——近代中國研究集刊第四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頁213-254。而中國與朝鮮之間的書籍流傳的途徑，則除了從中國輸入以外，尚有採購、翻刻、饋贈、編集等方式，見張伯偉，〈明清時期女性詩文集在東亞的環流〉。此適足以與中日書籍交流方式相對照。

137 截至目前，中國出版史研究關於宋明兩代的討論最為熱烈，特別是晚明江南的出版書籍史特別受到矚目，清代前期至近代之間的書籍史研究則較乏人問津。相關討論見 Tobie

很難解釋清代唐船運送至日本的書籍，是在何種出版印刷背景下產生。<sup>138</sup>在大庭脩的巨著中，曾討論唐船持渡書籍的出版地，簡單提及「清代出版中心與長崎因口船往來而直接相通」（頁47），然當試圖解釋為何南京船輸入最多書籍，而福州船則無時，他認為福建出版業的衰落緣於福建書店街被焚毀，以及建安刻書在萬曆以後逐漸沒落。其云福建出版事業在清代日趨衰微，福建船不載書籍在情理之中，但未解釋為何福建船隻攜帶書籍量少。<sup>139</sup>然福建地區方志有一些傳入日本，是經由哪些地區的船隻進口，有待釐清。實際上，清代出版物數量驚人，從大量方志、族譜、日用類書與叢書之印製，實在很難說清代的出版印刷業不興盛，我們期待有更多相關深入研究產生，以補充清代中前期至近代化印刷以前出版史之空白。從和刻本漢籍的研究可見日人如何閱讀清人著述，亦可令吾人推想將來觀察清代幾個區域出版中心之刻書與日本貿易需求之間的可能關係，當更得以看出中日文化交流與出版印刷書籍史之間的連繫。

附帶一提的是，書籍史在中國早有歷史悠久的相似學問：版本目錄等之文獻學。版本目錄學探討書籍印刷物的字體、尺寸、版式、行款、

---

Meyer-Fong, "The Printed World: Books, Publishing Culture, and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6, no. 3 (Ann Arbor, November 2007), pp. 787-817. 涂豐恩，〈明清書籍史的研究回顧〉，《新史學》第20卷第1期（2012，臺北），頁181-215。幸而 Cynthia J. Brokaw 的近代增進我們對清代出版書籍史的瞭解，見 Brokaw, *Commerce in Culture*, 尤其是第14章 "The Diffusion of Print Culture in Qing China," 頁535-570。井上進也曾提示明清兩代出版風格的斷裂，認為清初刊本在標示書商、刻坊、版權，以及封面與版畫品質等方面，均不如明末刊本。見〔日〕井上進，《明清學術變遷史：出版と伝統學術の臨界点》（東京：平凡社，2011）。

138 李伯重研究明清江南的出版印刷業時指出，清代比起明代，以私營者為主要大宗，而印刷物以民間通俗實用、商業利益者居多。他並提到明清的印刷生產仰賴外地市場，其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市場。見氏著，〈明清江南的出版印刷業〉，《中國經濟史研究》2001年第3期（北京），頁94-107、146。然清代中前期中方出口的史料與研究仍有限，有待未來深入挖掘與探討。

139 見大庭脩，《江戸時代における中国文化受容の研究》，頁45-47。大庭脩在此關於福建船未運書籍的謬誤，范金民已經指出，見氏著，〈縹囊細帙〉。

裝幀、紙墨、刻工刀法、藏書印記、序跋、避諱等。乾隆年間欽定之《天祿琳琅書目》，即是一本書籍史著作，其中詳細記錄清代宮廷所藏歷朝善本的物質條件與外型，以及收藏者姓名時代、里籍與書籍的授受源流，從中也可見編者鑑定版本之法，<sup>140</sup>以上均涉及了出版與書籍印刷史。<sup>141</sup>日本也有近似中國版本目錄學的「書誌學」，長澤規矩也即是這方面的著名專家。此學科在早期稱「書史學」，作為史學的輔助學問，到了大正末期改稱「書誌學」。<sup>142</sup>韓國也是用「書誌學」之名，來指稱目錄版本學。本文的研究，即是奠基在過往文獻學專家的研究成果，因此如何繼續發展中日歷史上已有的目錄、版本、書誌學問，參考西方書籍史研究關心的課題與研究取徑，建立屬於東亞的書籍出版文化史，或許是吾人研究東亞文化交流史可思考的方向。<sup>143</sup>

最後，本研究案例中的文化相遇、造成互動的觸媒，<sup>144</sup>不是傳教士、

140 最近的相關討論，可見楊果霖，〈《天祿琳琅書目》考辨古籍版本方法述評〉，《國家圖書館館刊》101年第1期（2012，臺北），頁23-50。

141 Cynthia J. Brokaw 由中國傳統的版本學、目錄學等研究，反省將西方書籍史研究取徑應用於明清書籍史的可能性及其侷限。見 Cynthia J. Brokaw, "On the History of the Book in China," in *Printing and Book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eds. Cynthia J. Brokaw and Kai-wing Chow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pp. 3-54.

142 [日]長澤規矩也，〈書誌學序說〉（東京：吉川弘文館，1979），頁1。大庭脩的研究即是在書籍交流的框架下，加入傳統書誌學的研究方法，一方面探討版本之間的關係，也從目錄來考察傳入日本的漢籍類型。

143 本文初稿發表在「第9屆文化交流史暨輔大歷史學系在台50週年：傳承與涵化國際學術研討會」（2013年11月8-10日）即省思及此，而最近欣喜見到相關研究，頗有共鳴。例如張伯偉強調，應以「環流」的概念而非中國典籍的東傳與回流來研究東亞書籍史。張伯偉，〈書籍環流與東亞詩學——以《清脾錄》為例〉，《中國社會科學》2014年第2期（北京），頁164-184。張伯偉，〈明清時期女性詩文集在東亞的環流〉。李晚芳《讀史管見》在韓國之收藏與閱讀，未來若能掌握韓國史料，將得以進一步探討本書在東亞之間的流轉。又趙益認為或可開展「文獻文化史」，深化中國古代文獻史的歷史作用與意義。趙益，〈從文獻史、書籍史到文獻文化史〉，《南京大學學報》2013年第3期（南京），頁110-121。

144 關於文化相遇的方法論，鐘鳴旦(Nicolas Standaert)提出四種研究的框架：傳播、接受、創新與互動溝通，以上雖非針對中日文化交流而言，然仍頗具參考價值。相關介紹可參

僧侶或文人，而是書籍。書籍與人作為交流的媒介，何者對文化影響較為直接，很難比較，但可以確定的是，江戶時代中日兩國文化相遇時，與西方傳教士到中國或日本所造成的文化碰撞，差異甚大。江戶時期的日本讀者對漢籍並不陌生，漢籍傳入日本已有長遠的歷史，且漢字的書寫與閱讀對他們來說也不是異域。<sup>145</sup>在這個漢字文化圈中，18世紀一位廣東才女對《史記》的部分摘錄與評點，於鎖國時期（1633-1858）的日本，對外知識渴求，唯有中國、荷蘭可以合法在長崎貿易的背景下，輸入東洋，並在19世紀中葉，不經改寫，使用與中國類似的印刷技術加以翻刻，從而流傳並保存下來。不難猜測，日本讀者閱讀本書時，得到了《史記》的相關知識，包括《史記》的精彩片段、歷來的評點與李晚芳的論述，並且幽發對一位別負史識的中國才女的想像。

\*本文部分初稿曾發表於日本長崎大學「日中文化交流広領域国際学術会議」（2010年10月7日）、「第9屆文化交流史暨輔大歷史學系在台50週年：傳承與涵化國際學術研討會」（2013年11月8-10日）與臺大歷史系103學年度講論會（2015年5月14日）。感謝與會學者、評論人趙飛鵬教授的建議指正，以及本刊兩位匿名審查教授的細心指正。

（責任編輯：石昇烜 校對：歐陽宣）

---

陳慧宏，〈「文化相遇的方法論」——評析中歐文化交流研究的新視野〉，《臺大歷史學報》第40期（2007，臺北），頁239-278。

145 Mary Elizabeth Berry 即提到中國的一些物品，在德川時代的日本，共用一種虛想的、無須接觸的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見 Mary Elizabeth Berry, *Japan in Print: Information and Nation in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6), p. 224.

## 引用書目

## 一、史料文獻

- 北京大學圖書館編，《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李氏書目》。北京：北京大學圖書館，1956。
- 〔清〕李晚芳，《女學言行纂》，收入李晚芳，《李萊猗女史全書》。
- 〔清〕李晚芳，《李萊猗女史全書》。安徽建德：周氏師古堂，1937；廈門大學與北京國家圖書館藏。
- 〔清〕李晚芳著，劉正剛整理，《李萊猗女史全書》。濟南：齊魯書社，2014。
- 〔清〕萊猗女史李氏（李晚芳），《讀史管見》。乾隆五十二年刻謄園藏版，清嘉慶年間印本；廣州中山大學圖書館藏。
- 〔清〕李晚芳，《讀史管見》。日本安政三年（1856）浪華書林羣玉堂刻本；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 〔清〕李盛鐸藏並編，《木犀軒收藏舊本書目》。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據北京國家圖書館藏民國抄本影印。
- 〔清〕阮元等修，江藩等纂，《廣東通志》。臺北：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1959。
- 〔清〕屠英等修，胡森、江藩等纂，《肇慶府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67 據清道光十三年（1833）修、光緒二年（1876）重刊本影印。
- 〔清〕梁煒，《菽堂分田錄》，收入〔清〕李晚芳，《李萊猗女史全書》。
- 〔清〕郭汝誠修，馮奉初等纂，《順德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4 據清咸豐三年（1853）刊本影印。
- 〔清〕陳志詰等修，吳大猷纂，《四會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67 據民國十四年（1925）刊本影印。
- 〔清〕黃芝，《粵小記》，收入吳綺，《清代廣東筆記五種》。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6。
- 〔清〕黃遵憲，《日本國志》。臺北：文海出版社，1968。
- 〔清〕黃瓚修，朱汝珍纂，《陽山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4 據清光緒十六年（1890）修、民國二十六年（1937）重印本影印。
- 〔清〕楊霽修，陳蘭彬等纂，《高州府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67 據清光緒十五年（1889）刊本影印。
- 〔清〕瑞麟、戴肇辰等修，史澄等纂，《廣州府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66 據光緒五年（1879）刊本。
- 〔清〕劉錦藻，《清朝續文獻通考》。臺北：新興書局，1959。
- 〔日〕〈昌平坂御官板書目〉，收入書誌研究会編纂，《近世後期書林藏版書目集》。東京：ゆまに書房，1984。
- 〔日〕〈寅十番船大意書〉，收入《船主沈敬瞻關係資料》，收入〔日〕大庭脩編著，《安永九年安房千倉漂着南京船元順號資料》。吹田：關西大學出版部，1991。



- [日]〈寅十番船齋來書目〉，收入《船主沈敬瞻關係資料》，收入大庭脩編著，《安永九年安房千倉漂着南京船元順號資料》。吹田：關西大學出版部，1991。
- [日]《官版書籍解題略》，收入《書目類編》。臺北：成文出版社，1978。
- [日]《書籍元帳》，收入大庭脩，《江戶時代における唐船持渡書の研究》。
- [日]《商船載來書目》（1804）。國立國會圖書館藏。收入大庭脩，《江戶時代における唐船持渡書の研究》。
- [日]《得泰船筆語》，收入[日]田中謙二、松浦章編著，《文政九年遠州漂著得泰船資料》。吹田：關西大學出版部，1986。
- [日]《鞅掌錄》，收入[日]早川純三郎、岩崎英重編，《會津藩廳記錄 原題公武御達並見聞集》。東京：日本史籍協會，1918-1926。
- [日]《諸藩藏版書目筆記》，收入《書目類編》。臺北：成文出版社，1978。
- [日]《齋來書目》，收入大庭脩，《江戶時代における唐船持渡書の研究》。
- [日]池內奉時（陶所），〈刻醉古堂劍掃敘〉，收入[明]陸紹珩，《醉古堂劍掃》，嘉永六年〔1853〕和刻本，見江戶後期詩人たちの周辺，<http://cogito.jp.net/kanshi/mado/suikodokenso.html>。
- [日]池內陶所，《如射書院藏書目錄》（書內頁標示《誦芬齋藏書目錄》）。京都府立総合資料館藏。
- [日]島田翰，《古文舊書考》，收入賈貴榮輯，《日本藏漢籍善本書志書目集成》，第3卷。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 據日本東京民友社明治37年（1904）聚珍排印本影印。
- [日]樂善堂主人（岸田吟香），《樂善堂書目》。東京大學總和圖書館藏。
- [日]澁江全善、[日]森立之，《經籍訪古志》，收入《古書題跋叢刊》33。北京：學苑出版社，2009 據清光緒11年（1885）印本影印。
- 加拿大麥基爾大學（McGill）、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明清婦女著作數字計劃」，<http://digital.library.mcgill.ca/mingqing/chinese/>。
- 全國漢籍データベース（日本所藏中文古籍數據庫），<http://kanji.zinbun.kyoto-u.ac.jp/kanseki>。
- 江戶後期詩人たちの周辺，<http://cogito.jp.net/kanshi/mado/suikodokenso.html>。
- 奈良女子大學所藏資料電子画像集，<http://www.lib.nara-wu.ac.jp/nwugdb/jindex.html>。

## 二、近人研究

- 丁琴海，〈《史記》辨旨——關於《史記》創述宗旨三種觀點的現代解讀〉，《東岳論叢》第22卷第4期，2001，濟南，頁89-90。
- 中山大學圖書館編，《中山大學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廣州：中山大學圖書館，1982。
- 中國古籍文化研究所編，《中國古籍流通學的確立：流通する古籍、流通する文化》。東京：雄山閣，2007。
- 巴兆祥，〈17-19世紀中葉中日書籍交流史的經濟學分析：以地方志為例〉，《清史研究》

- 2008年第2期, 2008, 北京, 頁37-48。
- 王勇、大庭修主編,《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 典籍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
- 王勇等,《中日「書籍之路」研究》。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
- 王勇,《書物の中日交流史》。東京:國際文化工房,2005。
- 王勇主編,《書籍之路與文化交流》。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9。
- 王勇主編,《東亞座標中的書籍之路研究》。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2012。
- 王慧榮,〈劉向『列女傳』在日本的流傳與影響〉,《或問》第22号,2012,吹田,頁87-93。
- 王寶平主編,《中國館藏和刻本漢籍書目》。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5。
- 王寶平,〈一百多年前一個日本人的上海手記——岸田吟香的『吳淞日記』〉,收入王勇主編,《中國江南:尋繹日本文化的源流》,頁207-225。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6。
- 王寶平,〈岸田吟香出版物考〉,收入杭州大學日本文化研究所、神奈川大學人文學研究所編,《中日文化論叢——1997》,頁10-25。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9。
- 王寶平,《清代中日學術交流の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05。
- 朱珊,〈船載書目所載明人別集考述〉,收入王勇主編,《東亞座標中的書籍之路研究》,頁302-339。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2012。
- 呂順長,〈清代赴日考察官紳日本訪書活動初探〉,收入王勇等,《中日「書籍之路」研究》,頁202-216。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
- 宋清秀,〈清代才女文化的地域性特點——以王照圓、李晚芳為例〉,《浙江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4期,金華,頁35-39。
- 李玉,〈中日文化交流的歷史見證——北京大學圖書館館藏日本版古籍簡析〉,收入氏編,《北京大學圖書館日本古籍目錄》,頁11-12。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
- 李仁淵,〈閱讀史的課題與觀點:實踐、過程、效應〉,收入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復旦大學中外現代化進程研究中心編,《新文化史與中國近代史研究——近代中國研究集刊第四輯》,頁213-25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 李伯重,〈明清江南的出版印刷業〉,《中國經濟史研究》2001年第3期,北京,頁94-107、146。
- 冼玉清,《廣東女子藝文考》。長沙:商務印書館,1941。
- 金程宇,〈《和刻本中國古逸書叢刊》前言〉,《東華漢學》第16期,2012,花蓮,頁254-285。
- 胡文楷編著,張宏生等增訂,《歷代婦女著作考(增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 范金民,〈縹囊細帙——清代前期江南書籍的日本銷場〉,《史林》2010年第1期,上海,頁75-88、188-189。
- 孫殿起錄,雷夢水整理,《販書偶記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 涂豐恩,〈明清書籍史的研究回顧〉,《新史學》第20卷第1期,2012,臺北,頁181-215。
- 秦曼儀,〈書籍史方法論的反省與實踐——馬爾坦和夏提埃對於書籍、閱讀及書寫文化史的研究〉,《臺大歷史學報》第41期,2008,臺北,頁257-314。

- 張玉範，〈李盛鐸及其藏書〉，收入李盛鐸著，張玉範整理，《木犀軒藏書題記及書錄》，頁 425-431。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
- 張伯偉，〈書籍環流與東亞詩學——以《清脾錄》為例〉，《中國社會科學》2014 年第 2 期，北京，頁 164-184。
- 張伯偉，〈明清時期女性詩文集在東亞的環流〉，《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 年第 3 期，上海，頁 95-106。
- 張偉雄，《文人外交官の明治日本：中国初代駐日公使団の異文化体験》。東京：柏書房，1999。
- 張聆雨，〈清代女性著述出版途徑考〉，收入南京大學古典文獻研究所編，《古典文獻研究（第十五輯）》，頁 146-167。南京：鳳凰出版社，2012。
- 張惠寶、李國慶，〈中國圖書館所藏和刻本漢籍及其文獻價值〉，《圖書館工作與研究》1999 年第 2 期，天津，頁 45-47。
- 張寶三主編，〔日〕住吉朋彥編輯，蔡碧芳助編，《臺灣大學圖書館藏珍本東亞文獻目錄·日本漢籍篇》。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8。
- 戚昕，〈16-19 世紀中葉的女性與出版〉。濟南：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碩士論文，2013。
- 陳捷，《明治前期日中學術交流の研究——清國駐日公使館の文化活動》。東京：汲古書院，2003。
- 陳捷，〈岸田吟香的樂善堂在中國的圖書出版和販賣活動〉，《中國典籍與文化》2005 年第 3 期，北京，頁 46-59。
- 陳捷，〈十九世紀七十、八十年代中國書畫家的日本遊歷〉，收入關西大學文化交涉學教育研究中心與出版博物館編，《印刷出版與知識環流：十六世紀以後的東亞》，頁 435-454。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 陳慧宏，〈「文化相遇的方法論」——評析中歐文化交流研究的新視野〉，《臺大歷史學報》第 40 期，2007，臺北，頁 239-278。
- 陸堅、王勇主編，《中國典籍在日本的流傳與影響》。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0。
- 彭斐章主編，《中外圖書交流史》。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
- 黃永年，《古籍整理概論》。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
- 黃俊傑，《東亞文化交流中的儒家經典與理念：互動、轉化與融合》。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0。
- 黃俊傑，〈東亞文化交流史中的「去脈絡化」與「再脈絡化」現象及其研究方法論問題〉，《東亞觀念史集刊》第 2 期，2012，臺北，頁 55-77。
- 楊果霖，〈《天祿琳琅書目》考辨古籍版本方法述評〉，《國家圖書館館刊》101 年第 1 期，2012，臺北，頁 23-50。
- 賈啟勛，《《史記》與日本文化》。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89。
- 趙飛鵬，〈傳播與回流——「和刻本」漢籍的淵源與價值〉，收入潘美月、鄭吉雄主編，《東亞文獻研究資源論集》，頁 225-252。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7。

- 趙 益，〈從文獻史、書籍史到文獻文化史〉，《南京大學學報》2013 年第 3 期，南京，頁 110-121。
- 劉正剛、喬玉紅，〈清前期廣東才女李晚芳探析〉，《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 年第 2 期，廣州，頁 153-160。
- 劉詠聰，〈「婦德莫病於私」——論李晚芳《女學言行纂》的「去私」思想〉，收入熊秉真主編，《欲掩彌彰：中國歷史文化中的「私」與「情」——私情篇》，頁 463-486。臺北：漢學研究中心，2003。
- 劉詠聰主編，《中國婦女傳記辭典：清代卷》。悉尼（Sydney）：悉尼大學出版社，2010。
- 鄧洪波，《中國書院史》。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5。
- 賴毓芝，〈伏流潛借——1870 年代上海的日本網絡與任伯年作品中的日本養分〉，《美術史研究集刊》第 14 期，2003，臺北，頁 159-242、245。
- 賴毓芝，〈清末石印的興起與上海日本畫譜類書籍的流通：以《點石齋叢畫》為中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85 期，2014，臺北，頁 57-127。
- 嚴紹璽，《漢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 〔日〕中山步，〈和刻本清人著述研究〉。上海：復旦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心博士論文，2008。
- 〔日〕大庭脩，《江戶時代における唐船持渡書の研究》。吹田：關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1967。
- 〔日〕大庭脩，《江戶時代における中国文化受容の研究》。京都：同朋舍，1984。中譯本：大庭脩著，戚印平、王勇、王寶平譯，《江戶時代中國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8。
- 〔日〕大庭脩，《漢籍輸入の文化史：聖德太子から吉宗へ》。東京：研文出版，1997。
- 〔日〕大庭脩著，徐世虹譯，《江戶時代日中秘話》。北京：中華書局，1997。
- 〔日〕小林善八，《日本出版文化史》。東京：青裳堂書店，1978。
- 〔日〕山口佳代子，〈近世大坂における出版業界の展開——大坂本屋仲間の視点から〉，《歷史評論》第 547 号，1995，東京，頁 43-59。
- 〔日〕山城喜憲，〈『史記評林』諸版本志稿〉，《斯道文庫論集》第 20 輯，1983，東京，頁 345-392。
- 〔日〕川邊雄大，〈幕末明治真宗僧の漢籍受容——以松本白華和北方心泉為例〉，收入關西大學文化交涉學教育研究中心、出版博物館編，《印刷出版與知識環流：十六世紀以後的東亞》，頁 455-469。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 〔日〕中村幸彦，〈和刻本〉，收入〔日〕水田紀久、賴惟勤編，《日本漢學》，頁 260-271。東京：大修館書店，1968。
- 〔日〕井上進，《明清學術變遷史：出版と伝統學術の臨界点》。東京：平凡社，2011。
- 〔日〕戶川芳郎，〈『史記評林』の版刻について〉，《二松：大学院紀要》第 10 号，1996，東京，頁 149-188。

- [日]永積洋子編，《唐船輸出品數量一覽 1637~1833 年——復元唐船貨物改帳・帰帆荷物買渡帳——》。東京：創文社，1987。
- [日]池澤滋子，《日本の赤壁會和壽蘇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 [日]米田彌太郎，〈貫名菘翁と池内陶所〉，《書論》第 17 号，1980，大阪，頁 86-96。
- [日]米田彌太郎，〈池内陶所の江馬信成あて書簡より——貫名菘翁のことども——〉，《書論》第 22 号，1983，大阪，頁 140-148。
- [日]辻本雅史著，田世民譯，〈十八世紀後半期儒學の再検討：以折衷派、正學派朱子學為中心〉，收入張寶三、徐興慶編，《德川時代日本儒學史論集》，頁 175-185。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4。
- [日]辻本雅史著，田世民譯，〈談日本儒學「制度化」——以十七至十九世紀為中心〉，《臺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第 3 卷第 1 期，2006，臺北，頁 257-276。
- [日]吾妻重二，〈文化交渉与东亚世界的书院〉，《東アジア文化交渉研究別冊》第 8 号，2012，關西，頁 41-48。
- [日]坂本宗子，〈近世後期大坂本屋仲間における別家衆の動向——河内屋一統を中心に〉，《大阪の歴史》第 57 号，2001，大阪，頁 21-59。
- [日]宗政五十緒、朝倉治彦編，《京都書林行事上組重板類板出入済帳》。東京：ゆまに書房，1977。
- [日]松田美由貴、日下幸男，〈京都本屋仲間記録『上組済帳標目』の分析〉，《龍谷大学佛教文化研究所紀要》第 44 号，2005，京都，頁 289-304。
- [日]松浦章，《江戸時代唐船による日中文化交流》。京都：思文閣，2007。
- [日]松浦章，〈『清嘉録』の日本舶載と和刻本の流布〉，《東アジア文化交渉研究》第 4 号，2011，關西，頁 373-389。
- [日]長澤規矩也，《和刻本漢籍分類目録》。東京：汲古書院，1976。
- [日]長澤規矩也，《書誌學序説》。東京：吉川弘文館，1979。
- [日]高田時雄，〈「日本所藏中文古籍數據庫」介紹〉，《漢學研究通訊》第 29 卷第 1 期（總 113 期），2010，臺北，頁 33-37。
- [日]高津孝，〈和刻本漢籍多樣性〉，收入 [日]大澤顯浩編，《東アジア書誌学への招待》卷 1，頁 111-128。東京：東方書店，2011。
- [日]高橋智，〈中国古籍流動史の確立を目指して〉，《中国古籍文化研究》第 3 号，2005，東京，頁 5-15。
- [日]高橋智，〈古籍流通の意義：善本和藏書史〉，《中國典籍與文化》2010 年第 1 期，北京，頁 96-108。
- [日]德富猪一郎，《近世日本国民史——文久大勢一變，下篇》。東京：民友社，1934。
- Berry, Mary Elizabeth. *Japan in Print: Information and Nation in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6.
- Brokaw, Cynthia J. "On the History of the Book in China." In *Printing and Book Culture in Late*



- Imperial China*. Edited by Cynthia J. Brokaw and Kai-wing Chow, pp. 3-54.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 Brokaw, Cynthia J. *Commerce in Culture: The Sibao Book Trade in the Qing and Republican Period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distributed b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 Chartier, Roger. "Texts, Printing, Readings." In *The New Cultural History*. Edited by Lynn Hunt, pp. 154-75.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 Chow, Kai-wing. *Publishing, Culture, and Power in Early Modern Chin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 Darnton, Robert. "What Is the History of Books?" *Daedalus* 111, no. 3 (Boston, Summer 1982), pp. 65-83.
- Hayashi, Nozomu, and Peter Kornicki, eds. *Early Japanese Books in Cambridge University Library: A Catalogue of the Aston, Satow, and Von Siebold Collec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 Ho, Clara Wing-chung. "Li Wangfang." In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Women: The Qing Period, 1664-1911*. Edited by Clara Wing-chung Ho, pp. 120-24. New York and London: M. E. Sharpe, 1998.
- Ko, Dorothy. *Teachers of the Inner Chambers: Women and Culture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中譯本：高彥頤著，李志生譯，《閨塾師：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
- Kornicki, Peter. *The Book in Japan: A Cultural History from the Beginnings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eiden: Brill, 1998.
- Meyer-Fong, Tobie. "The Printed World: Books, Publishing Culture, and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6, no. 3 (Ann Arbor, November 2007), pp. 787-817.
- Widmer, Ellen. "Guangdong's Talented Women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In *Text, Performance, and Gender i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Music: Essays in Honor of Wilt Idema*. Edited by Maghiel Van Crevel et al., pp. 293-309.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09.



# A Lady's Historical Comment across the Sea: The Printing and Transmission of Li Wanfang's *Dushi guanjian* in Nineteenth-century Japan

Yi, Jo-lan \*

## Abstract

The transmission of Chinese books to Japan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formation of book culture in the Edo period of Japan. Much research has been done by Oba Osamu (1927-2002) on this subject. But relevant topic o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is still little has been known, especially on how a specific book has been circulated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This article traces *Dushi guanjian* (*My Humble Opinions on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which was written by a talented lady Li Wanfang (1692-1767) in eighteenth-century Guangdong and was reprinted (Kabusebori) by Ikeuchi Toshō (1814-1863) in 1856, Osaka. The author takes this case study as an example to investigate book as a medium in the history of Sino-Japanese culture encounter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hrough this study, the author found that the study of cultural exchange and that of history of books should be merged together tightly so that they will not only be considered a matter of trading. Last, we may reconsider if it is possible to build up a special field for doing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books in East Asia.

**Keywords:** *Dushi guanjian*, Li Wanfang, Ikeuchi Toshō, Kabusebori reprints of Chinese works, History of Sino-Japanese book transmission.

---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No. 1, Sec. 4, Roosevelt Road, Taipei 10617 Taiwan (R.O.C.);  
E-mail: yilan@ntu.edu.tw

